

车慕奇 著

北京

一个知识分子的观察·思考

正风
前前后后

人民中国出版社

D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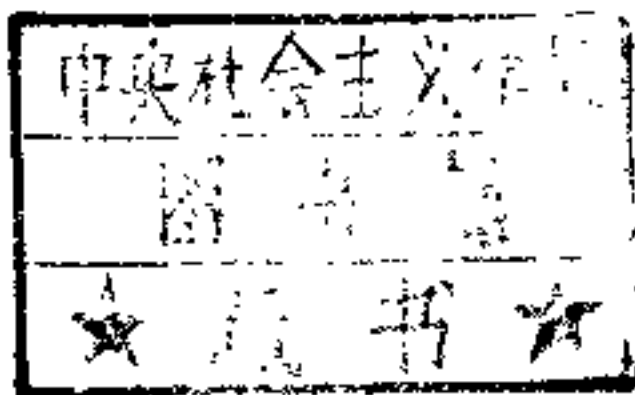


200150022

车慕奇 著

北京风波的前前后后

一个知识分子的观察·思考



责任编辑：李雪琴 陈忆青 陈肇莘

封面设计：李玉鸿

北京风波的前前后后

一个知识分子的观察·思考

车慕奇 著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外车公庄大街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7.25印张

150千字 印数1—60000册

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65-070-7/D.163

定价：2.75元

序

听说过这样一件轶事：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有一位失宠的伯爵，隐居在荒岛的灯塔上埋头从事历史著述。一天，灯塔下发生一起斗殴事件，伯爵站在窗口观看了整个过程。第二天，一位朋友来看望他，谈起昨天发生的一切，叙述的情节竟与他亲眼见到的大相径庭。伯爵感慨万分，喟然叹曰：“昨天刚发生的，而且都是耳闻目睹的事实，两个人的结论尚且如此不同，何况是千百年前的历史！”于是，他把已经写成的书稿付之一炬。

如果这件轶事只是说明历史的难写，当然是很生动的。但是，我决不赞成那位英国伯爵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于同一件事情，两个人由于观察问题的立场、角度、态度不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是很自然的。但是，历史事实终究是历史事实，任凭怎样掩盖、歪曲、篡改，最后还是要还它的本来面目。正直的历史学家，从来只对历史负责，而不计较一时的得失、褒贬、毁誉。焚稿，只能说是对自己应该坚持的真相不负责任。

1989年的春夏之交，在中国的北京发生了一场震动世界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千千万万学生、教师、学者、官员、新闻记者以及普通老百姓，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目击了全部事实。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缺少一本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出来的对这动荡的56天的纪实性著作。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短来不及落笔，也许是因为事情过于复杂还没有理清头绪，也许是因为对问题的认识还有相当距离，也许是还在等待什么……。然而，西方的宣传家却仍在无休无止

地胡说八道，往这段本来十分清楚的历史上任意涂抹斑驳陆离、千奇百怪的色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车慕奇同志写出了这本小册子：《北京风波的前前后后》。他本身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已经“超期服役”的新闻战线老兵，长期的慢性病使他已经不能再像当年那样健笔纵横，日试万言。但是，他勇敢地拿起了笔，写出了他认为应当写出的历史真相。如果他不写，没有任何人苛求他；写了，有可能招来一些麻烦。然而，他选择了后者。他的动机只有一个：作为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在如此重大、而又众说纷纭的历史事件面前，他不能像那位英国伯爵那样保持沉默，而应当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尽管他非常清楚，在震耳的喧嚣中，他微小的声音不足以振聋发聩，但他相信，正义的声音是阻挡不住的，当历史恢复它本来面目时，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一定会在丛中微笑，得到它应有的评价。

作为车慕奇同志的朋友和同行，我首先对他这种挺身而出的勇气表示敬佩；同时也感谢他要求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我把这当作是对我的信任。言之无文的我，写不出更多赞誉之词，想说的只是证实一点：他说的都是真话、实话。这些真话、实话，不是在今天的形势下才说的，而是在那惊心动魄的56天中，经常通过电话、见面向我讲过的。这说明，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敢于对历史、对自己负责的人。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说的实实在在的话，我完全相信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历史的考验。

花 敬 庭

(《经济日报》总编辑)

1990年3月22日

目 录

序	范敬宜
一、爱国民主运动，抑反政府动乱?	3
二、为什么流血避免不了?	22
三、从清华园看动乱	49
四、与北京相呼应的上海动乱	67
五、风波平息后的思考	88
六、中国能不能长治久安? ——40年的回顾与展望	114
附: 北京风波大事记 (1989年4月15日—6月9日)	147

一 爱国民主运动， 抑反政府动乱？

从总书记失态讲起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请愿学生，他拿起扩音喇叭说了一番话，总的意思是劝学生停止绝食。从电视新闻上看他说话的神态有点失常，结结巴巴，前言不对后语，失去党和国家领导人应有的风度。我边看边为他着急。

我正思忖着，听他冒出一句：“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卧过轨，不考虑后果……”顿了顿，没有说下去。我听了不觉一惊，心想，难道他后悔了吗？他怎么能把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学生卧铁轨抗议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的爱国行动与今天学生以绝食向人民政府请愿的行动相提并论呢？

现在已经很清楚，赵紫阳对学生说这番话时，已决心与党中央分道扬镳了。当晚，他就没有出席党中央召开的宣布派军队进驻北京的干部大会，从而在电视荧屏上向全国、全世界表明他的分裂态度。当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时，在公开亮相中失态并不奇怪。正是这种时刻容易暴露一个人的心迹。

我对赵紫阳“卧轨”的一段话特别敏感，因为我年轻时候也参加过学生运动，不但游行、募捐，与国民党政府的市长

辩论，还参预了游行罢课的策划，在“密室”里接受地下党领导人的指示……由于我在学运中出头露面，被学校开除，遭国民党当局通缉。对此，我从未后悔过。然而对1989年春天北京发生的学潮，从一开始我就有所警惕，当它发展成动乱之后，我就坚决反对，以致与一些好朋友发生争执。他们不解道：“搞学运的人为什么也反对学运？”我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说得清楚一点，解放前，我们参加的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爱国民主运动。而这次学潮，尽管有人千方百计想冠以“爱国民主运动”的桂冠，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显示它的矛头所向不对头。在这场斗争胜负分晓之后，它的策划者、组织者严家其（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万润南（原四通公司总裁）、吾尔开希（“高自联”头头）之流逃亡美国，低三下四地乞求洋主子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这岂不明白地显露他们丝毫没有中国人的骨气吗？

性质的不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方励之（原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严家其一带人所策划、组织的学潮真是“爱国民主运动”的话，人们支持声援就是正当的；政府反对、镇压就是错误的。如果不是“爱国民主运动”而是反人民政府的动乱，那么，结论就正好相反。

让我们从学潮爆发一开始来观察分析这场风波的性质。

借悼念胡耀邦发难

全世界都知道，北京风波是从4月15日天安门广场英

雄纪念碑下出现第一个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开始的。学潮一爆发就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而与学生生活待遇、学校管理一类涉及学生自身利益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胡耀邦逝世的讣告发表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出现许多挽联、大字报和小字报，借悼念胡耀邦之名提出政治性很强的口号。就在4月15日下午，当中午电台刚广播了讣告之后，人民大学就出现这样的对联：

悼胡公(胡耀邦) 骂李公(李鹏) 不如倒邓公(邓小平)

说千条 道万条 不如砍四条(四项基本原则)

在杂乱的大小字报中，这副对联一语道破天机，说明悼念胡耀邦是假的，真正的目的是要打倒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什么要反对邓小平呢？关键是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四条有一些人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要把它从宪法中砍掉。问题的关键在于砍掉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党和政府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就要改变颜色。

为什么一场推翻与保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风波从胡耀邦逝世引发出来呢？

这场政治风波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原计划在5月4日借“五四”运动70周年发难的，胡耀邦的逝世则为其策划者、组织者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时机。学潮提前发动了，而且借助胡耀邦在青年学生中的威望，壮大了抗议示威的声势。

胡耀邦在群众和广大学生中是有很高威望的。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复出参加党中央的工作之后，做了大量受到党和人民称道的工作，譬如，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

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使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件事很得民心。他猝然逝世，人民悼念他，党和政府给予高度评价。

但是，人无完人。胡耀邦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工作也有失误，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对那些坚持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化的人采取纵容的态度。1987年1月，他为此作了自我批评并提出辞职，不再担任总书记，后来仍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直至逝世。在悼词中有一句：“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正确的东西，敢于坚持；自己错了，勇于自我批评。”这既点出他有错误，又从正面肯定他的自我批评精神，在悼词中如此写是恰如其分的。

那些企图制造动乱的人，利用了群众怀念胡耀邦的感情，造谣攻击党中央对胡耀邦辞职处理不当，还造谣说胡耀邦是在政治局开会时被李鹏气死的。他们公然提出：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是非；二、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

学潮初期，通过学生头头王丹（北京大学学生，后为“高自联”头目）向政府提出的要求中，这二条是最主要的。与学生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人物在社会上制造舆论，也是在这两条上做文章。

4月19日，由《新观察》总编辑戈扬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参加者有严家其、苏绍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为胡耀邦“平反”；二为反自由化翻案。

为什么他们把斗争的焦点一开始就集中在这两条上呢？因为这两条既与胡耀邦有关，又直接指向邓小平所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一下子就把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变为带有强

烈政治色彩的学潮了。他们的手段是相当巧妙而毒辣的。

在这两条要求中，重新评价胡耀邦实在无多大道理，因为在中共中央的讣告中，说他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评价已是够高的了。回顾中共中央发布的周恩来的讣告，称这位中外崇敬的伟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两相比较，对胡耀邦的评价已经高得不能再高了。所以学潮组织者所提的第一条不过是为了煽动群众反对政府，实质性的要求还是第二条所提的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这是1986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下的定义。决议中加不加这句话是经过一番争论的。在草案付诸表决时，有一位中央委员当场提出异议。邓小平为此对全会说了一番非常重要的话，现在重读，联系当前的斗争还是很有启发的。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这种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

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看来，反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邓小平讲这番重要的话是在1986年9月28日。主持会议的是总书记胡耀邦，他实际上没有十分重视邓小平这番话，以致没有加以公布也没有向下传达，尤其是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得力，在1986年底北京、上海学生闹事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才提出辞职。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又专门作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在共产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同年1月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王若望（作家）、方励之、刘宾雁（作家）被先后开除出党。

回顾1986—1987年这段经过，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学潮的组织者方励之、严家其、王丹之流那么痛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以此为突破口达到制造动乱的目的。

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上是一种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说就是主张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潮。所以反对资产阶

级自由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必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必定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方励之早在 1986 年就说得明明白白：“中国现在没有一样不落后，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全盘西化。……我这个全方位概念，是让先进的文化全面的冲击中国，不是说哪个角度不要冲击。从经济、知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标准，全方位都可以冲击。但你不要先说哪个一定好，你不要先说坚持四条（指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这个、坚持那个，我觉得没有必要。”（1986 年 11 月 16 日在华东化工学院一座谈会上的发言）

因此，十分清楚，方励之、严家其、王丹之流提出彻底否定 1986—1987 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矛头就是针对四项基本原则。学潮一爆发，大量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以 4 月 15 日出现的“说千条，道万条，不如砍四条”提得最为直接了当。所以，风波乍起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的对立。

4.27 游行说明什么

从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到 22 日治丧结束，学生借故闹事，不仅大小字报铺天盖地，游行不断，罢课扩大，冲击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还在追悼大会会场上聚集 10 万人“闹丧”。事态发展越来越让人忧虑。4 月 26 日《人民日报》适时地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明确提出这是一场政治动乱。

后来知道，这篇社论反映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邓小平对学潮的看法。4月24日晚李鹏主持召开了常委会议，对事态发展作了分析研究，次日上午邓小平表示同意中央常委的分析和决定，指出这不是一般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这篇社论一发表，广大学生并没有看懂，误以为政府指责学生制造动乱，实际上是说极少数人利用学生制造动乱。那极少数制造动乱的人却看懂了，既然已被政府点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实质，就在策略上改变口号，降低政治调子，以争取广大群众。

4月27日，北京高校3万名大学生举行一次“成功”的游行示威。

那天早晨，我去上班时，见主要街道口有许多公安干警，尽管都是徒手，连警棍也没有带，但我仍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听说，前一天各大学的领导和教师都劝说学生不要上街游行，我暗暗希望他们能听从劝告，不要上街，以免与干警发生冲突。

在办公室内，我的心安不下来，就担心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扩大事态，后来听到街上喧闹声，忍不住走到门口观望。我看到警察排成行拦在街口，学生队伍过来一冲，他们抵挡不住，也就让开，没有动武。学生的队伍组织得相当好，有纠察队手拉手维持秩序，令我惊奇的是口号划一，打的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腐败”、“打倒官倒”等口号。

4月27日的学生游行对其策划者、组织者来说无疑是“大成功”，它以虚假的口号赢得了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同情和

认可。我就听同事们说：“你看学生多么可爱呀！他们喊出了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平时，我们对官倒腐败现象一再提意见，没有什么用，学生这一闹，政府该重视了吧！”

我不同意他们天真的看法，劝他们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从游行队伍的口号改变和降调就说明这里面大有文章：第一，口号的改变和降调是一种策略转变，为的是争取广大群众，一旦将群众拉到自己一边，就可以继续制造事端，逐步提高口号的政治调子，以煽动群众进一步与政府对抗；第二，口号的降调说明学生背后有懂得掌握群众运动策略的人在幕后指挥。

我这样说，同事们并不信服，他们说：“你能指出幕后策划者是谁吗？”我说：“从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看，这种变化说明一定有高明的人在背后操纵，究竟是谁，你就等着瞧吧！”

后来，《北京日报》6月16日发表一篇北大学生来信，果然揭出内幕：“4月26日，我们都被《人民日报》社论惊呆了。王丹急急忙忙从李淑娴老师（即方励之的妻子，北大物理系副教授）那儿回来说，我们要改变斗争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他急急忙忙参加会，会上订下了改变口号的决定。”

这就是说，方励之及其妻子李淑娴在背后指挥“高自联”的头头王丹，在《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发表之后，发出“新学联一号令”，统一规定了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在方和李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

后来，我才知道，早在4月21日，正当动乱初步形成时，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都贴出一张题为《原来是个阴谋》

的大字报，署名是“北大一醒者”，据这位同学说，李淑娴等人为运动安排了四步：第一步，悼念胡耀邦，顺便提出我们的政治要求。群众最恨腐败，别直接提反四条（四项基本原则），就用这一点（腐败）攻他们。第二步则到新华门（国务院大门）静坐，必要时往里挤，只要警察敢管，就是打人，这样才能唤起同情心，特别是女生，心软；就说警察专打女生，也能引起男生的“汉子感”。第三步，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有这个心理，这样事情就更大了，还能推向全国。第四步，“五四”达到最高潮。

事态正如方励之、李淑娴们所预谋的那样发展，只不过“五四”的高潮并没有形成，于是后来他们又策划了绝食请愿。

反腐败口号只是陪衬

应该说：4月27日以前，校园里和学生游行队伍里所提出的“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等等，尽管反映了学潮策划者的本意，但在群众中是得不到多少响应甚至不能赞同的。4月27日，他们改变策略打出“反官倒、反腐败、反官僚”为主调的口号，一下子抓住了民心。

许多好心人同情学生，就是看到这次游行所打出的“反腐败、反官倒、反官僚”的口号。其实，这些口号和要求，党和政府一开始就指出是同党和政府的主张一致的。5月4日以后，学生就不提这些口号了。

《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指出：“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

5月18日，李鹏会见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时说：“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做得对的，提得对的，提的很多意见也是我们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我坦率地说，你们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5月19日，李鹏在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上，更加明确地说：“对学生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将给予明确的答复，对他们的合理批评和建议，如惩治官倒、消除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我们将认真听取和采纳，以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5月21日，戒严司令部发布的致北京市市民书中指出：“执行戒严任务，完全是为了维护首都治安，恢复正常秩序。决不是对付爱国学生的。……广大人民群众关于惩治‘官倒’、反对腐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要求，人民解放军给予坚决的支持。我们执行戒严任务，恢复首都的社会秩序，正是为了创造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环境。”

6月6日，在平息暴乱之后，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仍然说：“各界人士包括青年学生，在前一个时期提出的惩治官倒、克服腐败、推进民主建设等等意见，政府都要认真地考虑，并且通过对话认真吸收各方面意见。”

既然广大爱国学生提的惩治官倒、清除腐败、推进民主建设进程，政府自始至终都表示同意和接受，为什么罢课、绝食、静坐、游行示威、占领天安门广场、冲击中南海新华门……仍持续不断，一浪高过一浪，造成社会秩序日益混乱，给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就说明，真意不在这里，他们另有所图。

《人民日报》社有人反对 4.26 社论

赞成或是反对 4 月 26 日《人民日报》社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人们站在政府或是学生一边的试金石。反对“社论”的人认为这次学潮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赞成“社论”的人认为这次学潮已发展成政治动乱。截然不同的观点，尖锐对立。

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插曲表明这种对立是多么尖锐、激烈。

当天安门广场请愿的学生已绝食 6 天之久，5 月 18 日《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黑体字头条大标题：“首都百余万人游行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强烈要求立即对话救人救国。”第二版上刊登了打着《人民日报》记者横幅的声援队伍的大照片，队伍中还有“反对 4.26 社论”的标语。我一看，不觉一惊，难道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真的“倒戈”了么！不觉火冒三丈。我的儿子是北京广播学院的青年讲师，对《人民日报》的反常表现也十分气愤，在室内踱来踱去，忽然说：“打电话责问他！”我立即赞成：“好！看他怎么讲？”

我们为什么这么着急、生气呢？4 月 27 日 3 万学生示威游行没有发生冲突，我们放心了。4 月 29 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与 40 余名高校学生对话，我们认为效果很好。5 月 4 日学生游行队伍比 4 月 27 日大为减少，游行结束时宣布复课。之后，北京约有 80% 罢课学生复课，局势出现了转机。我们支持政府在这段时期为促进对话所做的努力，但是学生方面却故意刁难，在政府对话人选和学生代表如何产生

上制造难题，反而说政府拖延对话。突然于5月13日宣布绝食，占领天安门广场，有意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在北京制造事端，丢政府的脸。学生绝食之后，新闻界、知识界、文化界一些头面人物亲自出马，游行声援。《人民日报》以客观报道学潮为借口，站在积极支持学生绝食的立场上，以大量篇幅报道各界人士的声援，一时间人们误以为党和政府支持学生绝食，似乎不上街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冷血动物”。在关键时刻，《人民日报》丧失立场，倒到反政府的人一边，影响极坏。我深深感到从这张党中央机关报上已看不到党中央的主张。5月18日的《人民日报》最有煽动性，连《人民日报》的一些记者都打着旗号去声援绝食了，大家都上街吧！所以我们父子俩看了火冒三丈。

儿子拨通了《人民日报》总编室，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人。下面就是双方在电话上针锋相对的对话。

“我是贵报十几年的老读者了。请问《人民日报》还是不是中共中央机关报？”

对方一愣，立刻反应过来，回答道：“当然是的。”

“既然还是党中央机关报，为什么不反映党中央的声音？5月18日的头版头条大标题和二版上你们报社记者声援队伍的照片，这难道反映了党中央的意图吗？”

对方回避开这个尖锐的问题，反问道：“请问你对4.26社论是什么看法？”

“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事态发展证实社论所提出的动乱确实发生了！”

“不敢苟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这种声音！”请注意！《人民日报》总编室的人公然表态反对《人民日报》4.26社论了。”

我的儿子马上反攻道：“那是你的荣幸！不要以为北京城都是单一的声音。我也是大学的青年讲师，我的同事中也有人和我一样反对学生绝食，更加反对你们声援绝食。你们不负责任的声援，无疑是把青年学生向死亡线上推！”

“请问你是哪个学校的？”

“这无关紧要，告诉你，我将把这张报纸永远保存下来，历史将证明你们错了！”

我们赞成《人民日报》4.26社论就是因为它明确地提出这场学潮已发展成为政治动乱。我们深感10年文革动乱已经使中国拉大了与先进国家的距离，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政治上的安定局面以进行建设，从而改善人民生活。谁制造动乱，谁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变换的口号与明确的目标

这场风波究竟是爱国民主运动还是政治动乱，可以从它发展全过程所提出的口号，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接受哪些政治势力的控制和影响，……等方面来分析考察。

在学潮初期学生所提的口号，前文已经介绍过了。4.26社论之后，他们把主要口号改为“反腐败、反官倒、反官僚”，这些不是策划者的真意，只是一个陪衬。

5月4日之后，陪衬的口号也很少提了，向政府提出主要的要求是两条：一、否定4.26社论，承认这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第二、承认运动中产生的群众组织。

说实在的，当时，我就担心政府在这两点上让步。因为很明显，如果否定4.26社论，就是承认学生在少数人煽动

下所作的一切非法行动都是正确的，那么以后政府怎样领导和管理国家呢？特别是“高自联”、“工自联”等非法组织不能承认，因为他们代表了一股反对现政府的政治势力。

“高自联”即“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前身是“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4月19日晚，王丹主持的第16次民主沙龙会上，传达了他们所崇拜的金观涛（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的意见：“学生这种无组织的力量应组织起来去动荡和摧毁中共这一组织的存在”。当场成立了“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第二天，这一筹委会常委召集北京各高校300余名学生酝酿成立“北京市高校学生联合会”，4月23日，成立了“北京市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4月28日正式定名为“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高自联”的政治纲领，从它一成立就是明确的。近期目标是成立社会各阶层代表，包括“高自联”参加的临时政府，其最高目标就是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高自联”是反对党的雏型。承认它就是承认反对党在中国合法化。

5月20日政府宣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之后，他们口号集中到一点，就是“打倒李伪政权”。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宪法批准建立的李鹏为总理的政府称之为“伪政府”，并要加以打倒，这不就是明明白白要颠覆合法的现政府吗？

6月17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北京大学学生披露“高自联”头头闹事的最终目的。

“我问他（王丹）最终目的是什么？他说最低目标让他们承认‘高自联’合法，给方励之平反、民间办报。最高目标是建立‘多元政治’，实现‘精英政治’。我问官倒还反不反？他说：那是小事。”



王丹本人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学生将为民主战斗到底》的文章，把目标说得更加清楚。

“我们不希望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与政府有所不同。我们公开宣布我们提倡充分的言论、结社和新闻自由，最终要建立一个西方化的政治体制，清除陈旧的政治思想……我认为目前学生运动至少有一个作用，就是在将来可以宣布，是的，我们是支持不同政见的人。”

(纽约中文《世界导报》5月17日)

所以，从全过程所提的口号统一加以分析，学潮组织者和策划者最终政治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就是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一句话，千方百计地颠覆现政府。

破坏法制的行动

为了达到这一政治目标，他们并不是像自己宣称的那样采取“和平民主的手段”，相反，采用了违反宪法、法律和法制的活动方式。他们口喊要民主，行动却是反民主、反法制的。

——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是不合法的。大字报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为流行，当时的宪法也规定公民有运用大字报的权利。“大字报”在十年动乱中起了很坏的作用，譬如，大字报的作者可以毫无根据地随意点名攻击任何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了原宪法第45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未经申请的游行示威是违法的。在学潮和动乱期间，从4月17日到5月19日的33天内，北京市大小游行有13次之多，隔二、三天就有1次，严重地干扰了市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任何国家为了保障社会安定，对游行示威都有相应的规定。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也于1987年颁布了关于游行示威的10条规定，游行事先须经申请批准。上述13次游行示威没有一次是合乎10条规定的。5月20日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游行示威更是直接违反戒严令。

——长期强占天安门广场，冲击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冲击人民大会堂、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破坏中苏高级会晤的活动……等等，是众所周知的严重违反法制的行为。

各类反动政治势力卷入

另外，这次事件是有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的，不是单纯学生闹事。

这次事件的直接组织者和策划者，是在前台表演的“高自联”头头王丹、柴玲、吾尔开希之流。他们与国内外反动势力有密切往来，崇拜西方，抱有政治野心，类似“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头头。

这次学潮不仅有方励之、严家其、万润南、李淑娴这些知识界自由化人物出谋划策，还有深谙党中央机密的被认为是赵紫阳智囊团的“青年官员”们发号施令，这些人听从赵紫阳前任秘书鲍彤的指挥棒。另外值得警惕的是，学潮一开始就有海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

在美国受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早在学潮初期就从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4月26日，张贴在北京大学三角地。这封公开信以“指导者”的口气，要求学生注意“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应把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其它社会各界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高自联”的头头们心领神会，此后大体就是循着“中国民联”指出的途径行动。4月27日，“中国民联”的成员刘晓波（原北京师范大学教师）从纽约奉派回到北京，一头就扎在“高自联”核心里，又是起草宣言、纲领，又是出谋划策，最后还亲自出马企图组织1000—5000知识分子大规模绝食未成，才纠合了另外三个人举行有限期绝食。

港台、美国和西方一些反动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有两件事清楚地说明他们的确干预了所谓“天安门事件”。

广场上绝食和静坐的人们，每天开支约10万元，主要是靠美国、香港和台湾一些人资助的。台湾当局公然组织各界声援动乱。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发起“送爱心到天安门”的活动，带头捐款10万元新台币。国民党中央委员黎昌意发起募捐1亿台币设立“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香港某些人则以支援绝食为名，在市民中募捐，号称募集到3000万港币。这些钱分批带到北京，例如：5月28日，“香港声援团”到北京，给天安门广场学生送来65万美金、200万港币。海外反动势力不仅给天安门广场提供了大量现金，还提供了种种物资和设备，如步话机、广播器材、帐篷……等等，以支持学生打“持久战”。

另外，暴乱平息之后，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等人

通过海外、港台预先设计好的方案潜逃出国，在法国、美国
和香港得到一些人的庇护，安排继续从事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

仅从这两件事看海外反动势力的插手不是十分明显吗！

对事态发展全过程进行分析，无论从口号和要求，从所
采用的手段，从卷入的各派政治势力看，4月以来发生的学
潮不是什么爱国民主运动，而是抱有明确的反动政治纲领，
采用背离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被国内外反动政治势力操纵的
政治动乱。事实证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对学潮的
定性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 为什么流血避免不了？

平息暴乱是中国内政

对待旨在颠覆政府的事态，按通常情理说，任何国家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和保卫巩固政权，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加以平息。

全世界不少有识之士，对于中国平息反政府暴乱是赞成的，有的表示理解和同情，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对纯粹中国内政的事务横加干涉，他们的所作所为，违背常理，这里姑且不予评议。

有一些对中国抱着友好感情的人，对中国政府动用部队平息事态不甚理解。有一位朋友就对我说：“难道中国不能采取和平的手段平息事态吗？政府对学生的某些要求就不能适当作些让步以避免矛盾激化吗？”对这些抱有善意的人，我愿意坦诚地说说自己的体会。

我身在北京，从一开始，日日夜夜观察事态的发展，无时无刻不为学生着急，对政府为难之处也有所体会，政府何尝不想缓和矛盾，何尝不想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最后，动用部队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递请愿书——冲击中南海

如果回顾事态的全过程，可以看到，为了避免伤害受坏人煽动进行越轨行动的学生，政府始终采取容忍克制的态度，而他们却步步紧逼，不断制造事端，动乱逐渐升级。

学潮一开始，学生头头王丹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例。

4月18日凌晨，王丹带领一批学生到人民大会堂前提出要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8时，王丹等人被请入门内，负责同志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接受了请愿书。

事情到此已告结束。王丹等人又出新花招，要求和人大委员长对话，后来降低要求，说人大常委也行。为了施加压力，下午3时他煽动学生冲击人民大会堂。

下午5时，接待人员答复，人大常委3位委员可与学生对话。王丹突然改变主意，提出不用对话了，要求人大代表于晚7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前再次接受他们的请愿书，并说当众接了请愿书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到他指定的时候，3位代表当众从他们手里接过请愿书。预先得到王丹通知的10多名外国记者到场拍照。他们已经达到扩大宣传的目的，事情却仍没有了结。

王丹又带领人马到中南海的新华门闹事。2000多人围在新华门前，堵塞了北京的交通主动脉长安街。他们每隔半小时冲击一次新华门，打伤守卫的警士，从4月18日晚一直闹到19日凌晨。

19日凌晨4时20分，市政府在现场广播了通告，指出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要求在场的人群离开现场。在工作

人员和警察劝说疏导下，围聚的人逐渐散去。

但是，事情还没有了结。

19日晚到20日凌晨，又有数百名学生在王丹等人鼓动下再次冲击新华门，有些人发表煽动性演说，有些人向警察投掷砖块和汽水瓶，当场有4名警察被打伤。事态进一步升级了。警察仍然采取克制态度，一面劝说，一面维持秩序。一直闹到20日晨天快亮时，当局只好用公共汽车强行把闹事的200多人运回学校，没有逮捕拘留一人。

第二天，全市传出谣言：警察打人，多少人倒在血泊中云云，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个“4.20血案”。

以绝食相要挟

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访华与中国党政领导举行高级会晤，这是举世瞩目的中苏之间举行的国事活动。按原订计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戈氏还将向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然而强占广场的学生拒不听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劝告，坚持占领整个广场不撤退，以致上述两项活动无法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中苏首脑会晤也因而推迟两小时。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强硬手段迫使学生撤退，也没有抓学生问罪。那些日子，我对学生不顾国家体面的行为十分气愤，同时也感到政府实在太为难了。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学生的坏头头们故意选择戈尔巴乔夫到北京的日子绝食示威，就是要出中国政府的丑。

绝食是对政府的示威，而被反对的政府却下令北京市保护他们，绝对不许让一个绝食的学生死亡。于是，市政府以

红十字会名义派大批医疗队，先后调配了 100 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万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 52 家医院腾出近 2000 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

为了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对绝食现场进行大清扫。5 月 18 日预报有雨，连忙抽调 78 辆大客车供绝食学生避雨。政府对反对自己的人采取这种忍让照顾的态度，却得不到抗议者丝毫积极的反应。

学生的绝食口号是要求与政府对话。在绝食现场打出一面大横幅：“绝食罢课，请求对话。”不明真相的人认为：学生要求对话，政府及时出来和他们见见面，不就了事了吗？社会各界人士举行声援绝食游行，也打出“敦促政府，及早对话”的口号。一时间，压倒一切的舆论是政府拖延对话，置学生生死于不顾，简直是“不人道”。

事实真相是怎样呢？从一开始，政府就对对话采取积极态度。“高自联”代表 5 月 13 日凌晨 2 时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 4 时，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5 月 13 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 5 月 15 日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一个 20 人的名单，政府同意之后，又要求增至 200 人，还没有等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之后 4 小时，竟发动绝食，抗议政府拖延对话。事实是早在 5 月 11 日他们就决定绝食，与政府交涉对话只是为了制造舆论罢了。

要的是谈判不是对话

尽管“高自联”的头头们无理取闹，政府仍然通过各种途径谋求对话。

5月14日凌晨，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和李锡铭，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等人到天安门广场劝说绝食学生回校，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次公开对话。5月14日下午，李铁映、阎明复（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尉健行（监察部部长）与30多所高校代表（包括在广场上的绝食的学生代表）坐在会议桌前进行认真的对话。第二天又继续对话3小时。

5月18日，中央领导人刚从重要的中苏会谈中抽出空来，早晨5点，中央常委就到医院去看望绝食学生并谈了话。当天上午，李鹏又和李铁映、李锡铭、阎明复、陈希同等人在人大大会堂会见了绝食学生代表王丹、吾尔开希等人，一一倾听了所有代表的意见和要求，又诚恳地讲明了党和政府的意见。这可算是“最高级的对话”了吧？吾尔开希却宣布：“这不是对话，而是见面”。他们与政府总理面对面谈了1个小时左右，居然说只是见面，没有对话，那么什么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对话”呢？

“高自联”5月2日递交的对话的12条要求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对话”条件。举其要者：“双方发言均等”、“对话在双方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等等。

提出这类苛刻的条件，分明是以反对派姿态与政府谈判，这怎么叫“对话”呢？5月2日，清华大学就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走向谈判桌》，公开宣称“我们现在应该走向谈判桌，而不是对话桌。”策划动乱的人以“要求对话”为借口，蛊惑人心，挑起事端，压政府与他们作政治谈判，迫使政府在政治上作出让步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王丹在美国报刊发表文章，公开宣布：“我们要建立一个西方化的政治体制，清除陈旧的政治思想！”既然他们有既定目标，政府尽管做出种种让步，如果不退到他们划定的底线，他们是决不会罢体的。

强占天安门广场

自5月13日学生绝食团占领天安门广场之后，北京以至全国的局势日趋恶化，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

学生的幕后策划者用绝食手段加深动乱是很毒辣的。早在4月中旬，就有人对王丹说：“可以用绝食的办法。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绝食，学生一个个倒下来，救护车在街上哇哇一叫，市民都跑出来看，稍微顾及面子的政府都不能置之不理。”

方励之则鼓励王丹说：“绝食两天，政府就会投降。”他们选择5月13日开始绝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两天之后就是戈尔巴乔夫抵京的日子，在苏联贵宾和世界各国记者面前出丑，政府吃得消吗？

尽管学生的绝食掺了假（有所谓接力棒式的绝食，即相互轮流绝食，也有的绝食者实际上是吃面包、糕点、巧克力的），但是

3000 多人参加了持续 7 天之久的大规模绝食确实震动了全北京、全中国。

占领天安门广场的人一天不撤退，一天就是动乱之源。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这里演讲攻击政府，散播政治谣言，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共同策划反政府的行动。全国各地有 85 所高校学生先后奔向这里来参加绝食或声援。全国有 84 个大中城市举行游行示威。

绝食不停，北京各界声援绝食的队伍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声援声势越来越大，绝食者想罢也罢不成。

有的参加绝食学生回顾当时的心态道：“我们绝食的人好比台上的演员，声援者犹如观众。演员看到观众那么热情，下不了台。观众看到演员演得起劲也不能退场。我们谁都走不出这个怪圈。”

绝食者被“高自联”组织的五道封锁线团团围住。有的学生说：“我们被群体效应捆在一起了，在这里自由也是奢谈。”有的老师和家长劝学生回去，他们偷偷地说：“我们想回也回不去了！”

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把绝食的学生作为“人质”，要挟、强迫党和政府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置学生的健康和生命于不顾。

家长和教师劝罢不成，北京市红十字会代表几次出面交涉，让“高自联”把学生交给红十字会送到医院也不成。李鹏总理亲自对“高自联”头头说让红十字会照料绝食学生，则遭到粗暴的拒绝。看来，不采取果断措施无法使绝食中止，也无法让天安门广场恢复平静。

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中外古今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容忍

抗议者占据其首都中心广场长达 20 余天之久，除非这个政府甘愿倒台。天安门广场是政府举行大典和迎接国宾庄严的地方，天安门则是新中国的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上就有其图案。在政治上如此重要的广场能容许人长期霸占吗？试问美国白宫前草坪或英国白金翰宫前的广场能容许人安营扎寨吗？

从 5 月 15 日起，北京街头几乎天天有游行示威和声援绝食的队伍，城区交通几乎瘫痪。5 月 17 日以后，共有 60 多路公共电汽车停驶。大批职工上班受阻，工厂的原料不能及时运进，产品不能及时运出，直接影响了工业生产。市属 425 个大中型重点企业中，已有 35 个处于半停产状态，16 个已经停产。工人和厂长强烈呼吁终止混乱状态，否则正常生产无法继续保持。

由于交通瘫痪，家庭必需的煤气罐、煤饼、粮食、蔬菜、牛奶的运输受到阻拦。报纸、邮件不能及时投送，垃圾清运、道路清扫和公厕清洗不能及时进行，市民正常生活受到干扰，闹得人心惶惶。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学生纠察占据了市区的许多交通岗亭，任意拦截车辆，随意盘查，唯有挂着红十字的救护车才自由放行。北京市一位副市长乘小轿车外出，被头上裹着白布条的学生纠察队拦住，要求检查工作证。司机想如果让他们知道后面坐的是副市长岂不引起麻烦，突然，灵机一动说：“我拉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某某先生。”这才放行。中央举行重要会议时，居然有的部长和将军不能到会，原来在中途被学生纠察拦住了。事态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任何一个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政府不能不采取果断的措施。

最让人受不了的还是精神上的烦燥和不安，时时担心不

知政治上的“地震”什么时候会到来。我看那些头裹白布条的“民主斗士”站在卡车上呼啸而过，自然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内心不由产生难以抑制的反感。你说他们“爱国”罢，为什么尽在外国人面前丢中国人的丑？你说他们“要民主”罢，为什么尽干违反法纪的坏事？他们还到中学去鼓动游行罢课，中学生果真闹起来，就像“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一样，真是不可收拾了。我还看到家门口一所幼儿园的小朋友，竟然在头上缠上“声援绝食”的白布条，真正感到悲哀了。大人们已经闹得不像话了，何苦还要来污染幼儿的心灵呢？

无政府状态必须结束！国家幸甚！民族幸甚！这是动乱的五月中，我内心的强烈呼声。

部队被阻在城外

抱着这种心情，我和家人在5月19日晚从电视上看到李鹏在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是鼓了掌的。杨尚昆宣布要调一部分解放军开进北京维持治安，我意识到政府将采取戒严措施，北京的无政府状态有希望结束了。当晚，荧屏上还打出字幕，报道天安门广场学生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紧张了好久的心情顿时松弛下来。我是抱着一觉醒来，局势就会扭转的心情上床的。

第二天清晨，我被电话铃唤醒。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大批部队被堵在城外，只有一支部队乘火车到达北京站，也被堵在站内出不来。这个意外的消息使我惊呆了。

我跑到家门外，只见路口有人设了路障，一排铁垃圾桶

挡着路，只留仅够一辆汽车通过的小口。头缠白布条的学生纠察队守在路口，强行检查来往车辆。原先这条路上通行的好几路公共汽车都不见影子，路人左一堆右一堆在七嘴八舌地议论：

“全市公共交通都停开了！”

“是工人罢工了吗？”

“好像不是。到处都是路障，车怎么开？”

“千万不要停水停电！”

局势不仅没有扭转，人心又重新浮动。

原先卡车、汽车穿梭往来的马路，如今显得出奇的静。我沿着路边走，怀着沉重的心情思忖：难道军事行动的机密被人泄露了？不然几路进城的部队怎么都被拦截了呢？没有武器的老百姓怎么能拦住手持武器的部队呢？部队必定是接到不准开枪的命令，他们的任务是维持治安呀！既然不能开枪，不明真相的学生和市民又拦着不放，部队进不了城，事态又怎能平息呢？我转面一想，大军压境，也是一种威慑力量，多少可以起点作用吧！

后来才知道，确实有人泄露了机密。陈希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写道：“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戒严的消息。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前45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相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

手持冲锋枪的战士坐在军车上，群众团团围住车不让向前开。有的爬到车上向战士“宣传”，号召“起义”；有的谩骂，有的抛砖头。战士们默默抱着枪坐着，真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种情景在许多电视录像上都可以看到。

世人人都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多么强大战斗力的部队，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多么英勇无敌。如果他们允许开枪的话，眼前这些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阻拦他们开进城吧！他们是严格遵守纪律的。上级下达了一条纪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他们严格遵守。

为了避免与群众冲突，等待群众的理解，绝大部分部队奉命后撤，驻守郊区，没有强制进城。

这是党和政府又一次容忍克制的表现，部队在郊外驻守了近半个月没有向城内开进。明眼人都知道，不是部队进不了城，而是不愿伤害群众。

戒严不是军管、宵禁

根据李鹏总理发布的命令，北京部分地区从5月20日10时起实行戒严。

外界对中国的戒严有误解，有人以为戒严就是军事管制，军队取代政府管理一切；也有人以为戒严就是宵禁，入夜以后，禁止一切交通和娱乐活动。其实，在中国，戒严既不是军管也不是宵禁。北京市政府的一切工作照常，根据李鹏代表国务院签发的戒严令，戒严这项任务“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戒严部

队是在北京市政府领导下执行任务的。

根据《北京市政府令》：戒严的目的和任务——迅速制止社会动乱，维护首都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社会生活秩序。

戒严期间的禁令：

——严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其他聚众妨害正常秩序的活动；

——严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制造和散布谣言，进行串联、演讲，散发传单，煽动社会动乱；

——严禁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严禁冲击广播、电视、通讯等重要单位，严禁破坏重要公共设施，严禁打、砸、抢、烧等一切破坏活动；

——严禁骚扰各国驻华使馆和联合国驻京机构。

发生上述应予禁止的活动，公安干警、武警部队和人民解放军执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由此看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戒严实际上就是政府动用一部分部队来协助公安干警、武警部队维持正常的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制止社会动乱。

既然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的任务就是维持治安，为什么要动用正规部队参加进来呢？这是许多不了解实情的外国朋友想不通的问题。事实上，北京市并没有预计到会出现规模如此大的社会动乱，所以日常戒备的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已不够用。相对不足的队伍从4月下旬起日日夜夜对付一些人挑起的一次接一次的事端，已经疲惫不堪了。与卷入动乱的人数和力量比，他们的力量已远远不足以应付那样严重的局面了。在这种情况下，才调一部分部队进城协助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来执行戒严任务的。

我有一个外地的亲戚要购买回程的卧铺票。为了提早排队，他凌晨4点就步行去车站。后来我问他：“天还没有亮，你单独在街上走，遇到巡逻队盘查没有？”“遇见了，擦肩而过，并没有盘问。我随身带着工作证，就是查问也没有事。”可见，戒严不是宵禁，夜间行动也是自由的。对于奉公守法的市民来说，戒严不仅毫不影响个人自由，反而感到受到保护，更加安全。平息暴乱之后，大家都有这种感受，这是后话。

“动乱源”没有消除

5月20日实行戒严之后，到6月4日平息暴乱之前的这段日子还是很难熬的。大部分戒严部队在城外没能到位，戒严令所列严禁游行示威……等项禁令执行不了。局势在进一步恶化。

天安门广场仍然被强占。这个“动乱源”没有消除，全北京乃至全中国都得不到安宁。动乱策划者扬言要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决心赖在广场与政府作“最后的决战”。5月24日，广场上举行了所谓“保卫广场”誓师大会，王丹发表讲演说：“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这种无能的政府也是一定会垮台的，坚持就是胜利。”他们要把广场变成“全国民主运动的震中和心脏。”他们企图长期占领广场，指挥全国。

为了鼓舞“士气”，5月29日，“高自联”在广场上树立一个女神像，这是依照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塑造的，起初就叫“自由女神”像，后来感到太露骨，才改称“民主之神”像。不

管叫什么，人们都知道它是这些“民主斗士”的精神支柱——美国式的民主自由。

在广场上，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等等与党内支持动乱的人勾结在一起密谋推翻政府。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头头开会，提出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军队撤退，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只有政府答应这6条，才进行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光荣”退出广场。

与此相呼应，万润南控制的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玩弄欺骗手段，征集人大常委委员联合签名，“要求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以“取消戒严令”，“罢免李鹏”。

这时，天安门广场公开喊出：“打倒李伪政权”的口号，散布“外交部脱离中央政府”、“世界30多个国家宣布不承认中国政府”、“新政府名单已拟定”等谣言，摆出了推翻政府建立新政权的架势。同时，上百辆摩托车组成的“飞虎队”黑天白日围着中南海和中央要害部门转，造成威吓的声势。这些人大多是刑满释放者、流氓等社会渣滓。

这期间，北京街上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几乎没有间断，除学生外，知识界最为激烈。

这段日子里，我内心焦急如焚。部队不能动武，也就进不了城，而部队进不来，戒严令就执行不了，城内被坏人煽动起来的人闹得更凶。他们想什么时候闹就什么时候闹，想在哪里闹就在哪里闹，想打倒谁就喊打倒谁，毫无顾忌。

后来知道，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仍然想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

5月22日至24日，北京市红十字会在政府授意下，连

续三次派人做占领广场学生的工作，希望他们顾全大局，撤出广场。

5月23日至27日，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多次派人同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代表接触，劝说他们撤出广场。

戒严部队司令部也派人多次与学生座谈，交流对形势看法，规劝他们尽快撤离广场。

广场上许多学生也愿意撤离。但是“高自联”的头头们坚持不撤，他们的“高参”李淑娴说得很明白：“美国卫星天天看着你们，不能撤！”看来，政府再做什么让步也无用，除非答应他们的6个条件，那就等于拱手交出政权。想要保卫政权，戒严部队就一定要进城。

戒严部队克制的态度

在城外等了14天之后，戒严部队终于在6月3日零点向城内开进。这时，他们接到的命令仍然是严禁开枪，仍然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有的部队完全不带武器，徒手跑步进城；有的部队着便衣，不带武器，化整为零，分散步行进城；有的进城部队带了武器但不发子弹。……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避免与不明真相的群众发生冲突，力争不要流血。

然而，事与愿违，从6月3日零点到晚10点，整整22个小时，进城部队被拦截在城周围各个路口，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一天，形势严峻，情况复杂，谣言满城飞。我接到一

位老太太的电话。她说：“戒严部队开进城来啦！开道车压死了学生，惹起了众怒。一伙人和解放军冲突起来，可不得了啦！”

我的小儿子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听到这番话说：“什么戒严部队开道车！完全是造谣，明明是我们电视台借用的一辆吉普车出了交通事故，和戒严部队没有一点关系。”

6月2日晚上10点55分，中央电视台建国40周年摄制组向武警北京总队5支队借用完毕的一辆三菱吉普车，在返回部队途中，因车速过快，加上路面洒水车轮打滑，发生重大车祸，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但无一人是学生。司机陈福玉被西城区公安分局拘留。这一交通事故被别有用心的人借以造谣说：“为戒严部队开路的军车压死了3名学生！”煽动市民去堵截进城军车。偶然的交通事故却成了不明真相群众围堵进城解放军的导火线。

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暴乱真相”录像上，我们看到徒手进城的队伍，仅仅背着雨衣跑步前进，被雨点般落下的砖头打得狼狈不堪。有的掉队的战士被暴徒围住狠打；有的战士被暴徒从立交桥上摔下来，浇上汽油烧死，又被剖腹，挑出大肠。一派法西斯暴行，惨不忍睹。我的儿子是从不流泪的男子汉，看到此情此景放声大哭，一面啜嚅着说：“对暴徒能用‘妇人之仁’吗？”

在电视录像上，我们还看到一位高级将领被暴徒毒打致伤，躺在医院病床上，他是戒严部队某部副政委张堃少将。他的腿和肋骨被打成骨折，平躺在床上不能翻身。一位高级将领居然被暴徒打伤，实在不可思议，难道周围的士兵不能保护他吗？难道他没有手枪自卫吗？我们从录像中看到有一批前往麦加朝圣的回民到医院慰问，少将对他们说：“我带领

一个师进城。我坐的车夹在队伍中间。我们手中有枪，但是，我没有下令开枪！”手下有一师之众的少将，宁肯自己被打伤致残，也没有下令开枪。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呀！

后来，从报刊上刊载的文章上看，至少还有3位少将被打致伤，他们是某部师政委邵松高少将、某部师长陈明义少将、某军政委张明春少将。

这22小时内，暴徒还抢劫部队武器弹药，冲击政府要害部门——人民大会堂、新华门、广播电影电视部和中宣部。占领天安门广场的“高自联”、“工自联”头头向群众分发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鼓动他们“拿起武器推翻政府。”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证明1个多月以来少数坏人蓄意制造的动乱已经发展成为反政府的暴乱。戒严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奉命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平息暴乱。

当天下午6时开始，电视台和电台就一再播放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劝说广大学生和市民不要上街，不要妨碍戒严部队执行任务。我一直坐在电视机前，紧张地不知所措地等着，不知木木然地坐了多久，到晚上10点钟左右突然听到远处传来枪声。善良的人不愿看到的事终于发生了。

各道口的戒严部队是十分克制的。在被阻拦和包围中，在忍无可忍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鸣枪开道，主要是对空开枪以示警告，或是对地开枪驱散拦路的歹徒。但一些亡命之徒不顾这一切，用砖头、铁棒猛打戒严部队干部战士，在生命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战士们才迫不得已开枪自卫，击毙了一些暴徒。但是，由于围观的群众和在场的学生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或流弹击中，造成了误伤，这是大家都很痛心的。而这些不听劝告上街围观的人又

确实给部队带来严重的困难，使他们不易镇压暴徒，以致自身造成重大伤亡。不然的话，部队怎么会有这么大损失呢？军警受伤 6000 多，死亡数十人，被烧军车 1000 多辆，装甲车 60 多辆，警车 30 多辆。还被抢走一批武器、弹药……

事后，解放军一名军官对人说：“如果环境允许我们当兵的放开手干，平息北京的暴乱，只要一个营的士兵就足够了！但是，我们面对着围观的市民，明明知道暴徒就藏在他们身后，我们下不了手呀！”

美国《时代》周刊 1989 年 6 月 19 日一期刊登了一张照片，一个赤手空拳的人拦住了一溜坦克车。我在北京电视荧屏上也看到了这个镜头。坦克开来，这人站到路中阻挡，坦克向一旁拐，似企图绕开，这人也向同一方向闪，还是被拦住。坦克既没有不顾一切地碾过去，也没有开枪。

不管美国传播媒介利用这张照片作怎样的歪曲宣传，稍有常识的人冷静地想一想，一个赤手空拳的人为什么能拦住一溜坦克呢？难道这不是开进城的戒严部队严格遵守采取克制态度命令的明证吗！

戒严部队进城目击记

下面请允许我引用一位美籍华人写的戒严部队开进城的目击记。熊玠先生是纽约大学教授，6 月 3 日深夜到 6 月 4 日，他从北京饭店屋顶亲眼目睹，从东面经过东长安街朝天安门广场方向开进的戒严部队行进的情况。

“午夜（6 月 3 日）后，我看到部队从东面向天安门跑步过来。士兵没有带钢盔也没有带武器，当接近广场

时，他们被一大群人拦住，被迫后撤，向他们开来的方向（东面）跑回去。部队撤退中群众在后边追赶，并向他们扔砖块、石头。

“过后不久，部队乘卡车返回，这次头带钢盔，手握枪。这时，群众设置了许多路障。载兵的卡车穿过路障前进，群众迎头扔来雨点般石头、砖块。在一段时间混战中，许多士兵被打死或打伤，有的手中武器被暴徒夺走。过后，后援部队开来了，才向道路两旁群众零星开枪，明显的是报复。两旁群众中除暴徒和学生外，有许多围观者。

“群众又奋力反扑。他们爬到开来的装甲车上，向车内扔燃烧瓶或其它可以着火的武器。有一辆装甲车着火了。车内3名士兵打开活门要从火中逃出，一群流氓叫喊：‘杀死他们，杀死他们！’一名台北电台记者当场录下了流氓的叫喊声。这位记者后来告诉我他亲眼看见这3名士兵被暴徒用大棒打死。两天之前，一位宴请过我的美籍华人，后来见面时告诉我，在他们住的公寓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说：一名士兵的尸体躺在烧毁的军车旁，杀死他的人们又浇汽油焚尸。我们看得出，暴徒的年龄大于大学生，完全不像学生。”

熊玠教授特别声明，他看到的是从东开来的部队情况。没有见到从西向东开的部队行进情况。传说，从西开来的部队不太“文明”。他感到困惑，自己目睹的部队是比较“文明”的，也就是在受到袭击或抢劫之前他们是不开枪的。为什么从另一方向开来的部队表现不一样呢？

恰好我有一位朋友住在复兴门外大街一幢楼（广播电影电视部对面）内，目睹了由西向东开进的部队行进情况。这

位朋友是《中国文学》社的副社长，名叫董良举。下面是她向我口述的目击记：

“我住在8层楼，从窗口向下望恰好是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大路——复兴门外大街。6月3日晚饭后，儿子对我说：‘快来看，外面情况不对’。我从窗口看下去，只见有一伙人在设路障。他们把隔离墩（注：铁棍联结水泥墩组成障碍物，原置放在马路当中，将马路分隔成左右通道）横过来挡道。还推来一辆汽车，横在马路当中，点火烧着。我的楼前200米长的路上共设置了五道路障。

“晚10点左右，听远处有枪声。后来，路上有人喊：‘来了！来了！’路上围观的人散开。部队没有来，人们又跑了出来。

“大约午夜，部队由西开来。开道的是一排手持盾牌的防暴队，只有20余人。后面是排成方阵的战士，再后是军车，头戴钢盔，手握枪的战士护在军车两旁步行。

“车队和队伍行进得很慢。因为开路的战士要排除路障，搬掉隔离墩，推开横在马路当中的车辆。部队边走边停。停下来时，躲在马路两旁的暴徒，向队伍扔东西，晚上看不清，像是砖块和燃烧瓶。部队遭到袭击，才鸣枪示警。我注意到多数情况是朝天开枪，也有时对地开枪，地上冒火花。我只见到一次是对人开枪。那人向一辆军车扔火把，把那辆车点着了。他又向另一辆军车扔燃烧瓶一类的东西，没有成功。这时，一声枪响，他躺倒在地，一辆平板三轮车把他拉走了。

“我们这幢楼和旁边一幢楼都有人在路边围观，后来我探听到无一人死亡。”

我的朋友目睹的情况说明，从西向东开的部队也是很克制的，不遭袭击不开枪，用熊玠教授的话说，也是比较“文明”的。她也认为向部队袭击的暴徒们说一口北京下流的土话，不像是大学生。

事实证明：制造暴行的暴徒主要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团伙、“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其他社会渣滓。

血洗天安门是谎言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非军人受伤 3000 多人，200 余人死亡，包括 36 名大学生。经北京市高教局核实，36 名大学生分属 20 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死亡 6 名，清华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各死亡 3 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7 所院校各死亡 2 名，其余 10 所院校各死亡 1 名。他们当中有人参加了暴乱，从他们衣服口袋里发现有“高自联”敢死队队员证或纠察队队员证。有的是在围观中被误伤致死的。

高教局负责人宣布，死亡的 36 名大学生，没有一人是在天安门广场出事的。

尽管外国谣传什么“血洗天安门”，广场上屠杀了 3000 多人，事实上，在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

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 6 月 4 日凌晨 5 时许撤退的。在他们撤退过程中，戒严部队没有向他们开枪，也没有用军车辗死人。国外的种种传闻和猜测是不真实的。至今没有任何人能拿出任何证据说明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死了人。

我看到的电视台播放的录像片显示，学生打着旗，排着队，缓缓步行，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撤离，完全没有被驱赶而仓惶逃跑的样子。6月6日，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工在记者招待会上负责地宣布：“6月4日凌晨4点30分至5点30分，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用坦克和军车轧死轧伤一个人。”

我对张工宣布的事实是相信的，因为后来一些目击者的叙述与张工所说，以及录像所显示的情况相符。譬如，人民大会堂里有3位工作人员从楼上俯瞰了广场清场的全过程，还有一位在广场东侧商店的工作人员从当天凌晨1点50分起直至黎明，目睹了广场所发生的一切。

他们叙述的清场经过，概括如下：

6月4日凌晨1点30分，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北侧的长安大街上，向广场反复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要求广场上的学生和群众尽快离开。前后广播了3个小时，这期间，部队没有采取行动。

经反复广播，大批群众逐渐离去。

学生代表向部队提出要求，能不能让他们和平撤离或者是自动撤退。

部队立即表示同意，并且又通过广播反复向学生说明，同意他们自动地、和平地离开广场。

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学生仍在争论是否撤离，后经口头表决，多数同意撤离。

4点40分左右，学生比较有组织地排队从广场东南方向撤离。部队逐渐进入广场，与学生队伍保持一定距离。学生走完后，战士逐个检查广场上的帐篷，确认里面没有人，

然后开进军车和装甲车将帐篷和障碍物推倒。到 5 时 30 分，清场任务全部完成。

整个清场过程没有向群众开枪。

有人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动用装甲车？这是便于清除广场上的障碍物，同时也是为了造成一种威慑的气势，还为了防止暴徒用砖石砸伤军人。

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很清楚了，然而还有人听信“美国之音”。我就问他，在平息暴乱中的确死了 36 名学生，这是各学校分别调查汇总的数字。有哪一所学校发现它的学生死在天安门广场？没有嘛！他们都是在各条路口拦截军车或者在围观时中弹的。

这使我想到宁夏发生的一场闹剧。有人造谣说，宁夏大学有 3 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被军车碾死，学生为此还举行了追悼会和抗议游行。然而不久，这 3 名学生“死而复生”，有 2 名活生生地回到宁夏首府银川，1 名被证实好端端地留在北京家中。谣言不攻自破。

从广场撤退的亲身经历

在广场清场前，有几名学生方面代表与戒严部队进行交涉，代表之一的作曲家侯德健，8 月 17 日在电视荧屏上出现。他在自己家中向记者叙述了 6 月 4 日凌晨自己亲身经历的情况。

侯德健说，6 月 3 日那天夜里，广场上情况很混乱，学生们对是否撤离广场意见不一。零时以后，学生们聚集到纪念碑周围。侯德健和另外 3 名参加“72 小时”绝食的人也在

内。

侯德健说，当时包括他们几个 30 多岁的人在内，很多人都不冷静。这时，红十字会的 2 名医生建议他们去和戒严部队交涉。6 月 4 日凌晨 3 时许，侯德健和另外 1 名参加绝食的人在 2 名红十字会医生的陪同下，搭乘一辆救护车去找戒严部队。

侯德健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前的长安街上被戒严部队拦住。戒严部队一位政委前来和他们会面，告诉他们广场的东南角留有让学生撤离的通道。

随后，侯德健返回到纪念碑前劝说学生撤离，当时学生们正用喊声的大小来决定撤还是不撤。侯德健说，当时他也听不清楚哪种声音更大，但他管不了那么多，见到学生就拉起他们，劝说他们撤离。这时，已有许多学生开始向广场东南方向撤离了。

他说，当时学生和部队战士的情绪都很紧张，双方都不知道对方要干什么。有些战士平端着枪，但当侯德健打手势要求他们把枪口朝上时，大部分战士这样做了。

侯德健说，在整个撤离过程中，他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市民或解放军战士被打死，也没有见到坦克或装甲车压向人群。他见到有三、四辆坦克停在广场外边。他说，他在广场上听到了枪声，并且看到在广场西南角施放了催泪弹。但是他说，枪是朝天开的，有的是朝纪念碑上的喇叭放的。

侯德健说，他是躺在担架上和一些人一起最后撤离广场的。他说：“当时我被蒙在大衣里，听到枪声后很害怕，但医生告诉我不要怕，枪是朝天放的。”

侯德健于 6 月 4 日从天安门广场撤出后，躲进某一个国家的驻华机构。在这期间他和外界取得联系，逐渐了解了外

界情况，决定离开外国驻华机构，8月16日他返回了自己的寓所。

一位教师的目击记

9月4日，新华社播发了一位教师目击天安门清场的经过，他是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的孔祥智，下面是他的谈话。

“6月3日下午，人民大学‘自治会’的广播一直鼓动人们去各路口围堵军车。我深怕学生们会采取什么过激行动，大约在晚10时左右，骑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指挥部和‘高自联’的喇叭都在广播。在‘高自联’的广播中，有人鼓吹‘以暴力对付暴力’，‘维护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我听了十分气愤，这不是把学生往火坑里推吗？于是，我想挤进去找那个演说的人，但纠察队员把我拦住了，我拿出工作证也不行。过了一会儿，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人大的帐篷，没有发现认识的学生，但几个人看到我戴着人大红校徽，便主动上来和我交谈。我对他们讲，今晚政府要采取措施，希望他们把大家劝回去。但他们认为可能性不大，有一个学生说：5月19日、20日夜里的情况比今晚严峻得多。我告诉他们，如果政府真的清场，希望他们千万不要‘自卫’，要迅速返校。他们答应了。大约12点10分，戒严部队就从西长安街开过来了。

“这时我正在人民大会堂西门的台阶上休息。部队过来时，我看到有一伙人朝部队扔石块。几个战士走过

来，他们便没命地往南跑。这几个战士对着天空开了枪，后来又有几个战士走过来，但没往人群开枪，否则我站在大会堂西门的路边上，还能打不着我吗？过了一会儿，我放弃了到车站取自行车的念头，想把广场上人大的学生劝走。

“当我走到人民大会堂南门东侧路口时，看见一队解放军战士由南向北行进，一辆坦克也在徐徐开进，广场已处于部队的控制之下，我不敢进去了。这时学生已聚集在纪念碑周围。

“过了一会儿，我向大会堂东门走去。那里有几百名解放军战士坐着休息，一些群众在和他们交谈，看来谈得很融洽。我看见一个人正在给一个小战士包扎伤口，便走过去帮忙，并与他们攀谈。我问那个战士：‘你是怎么受的伤？’他说：‘是群众扔石块打的。’他还告诉我，他的许多战友都受了伤。我看到四周的许多战士头上、手上、胳膊上确实包扎了白纱布。我对这位战士说，我相信大多数学生、市民是不会这么干的。他也同意我的说法。过了一会儿，又走过来一个军官与我们交谈。那个军官说，部队决不会向群众开枪，不会向大学生开枪。

“大约凌晨3时30分，部队开始集合，和我谈话的那个军官说：我们马上去清场了，我宣布，任何人都不许向学生、群众开枪，目前，这是最高纪律！”

“我和站在前排的十几名战士一一握手，祝他们顺利。正准备离开时，那位军官走了过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请你转告学校的老师们，我们是决不会向大学生开枪的，请你们放心！’我听了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

‘谢谢！谢谢！’

“约4时10分，广场上所有的灯都熄灭了，许多战士从大会堂东门走出来，出来后，有的在门前坐着休息，有的往北走，我便坐在南侧的松树下观看，心情既兴奋又紧张。紧张的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持枪的解放军战士，而且不知道怎样清场；兴奋的是，50天的闹剧即将结束了，人们的神经可以放松了。

“不久，学生就在纪念碑周围点燃了几堆火，火光冲天。这时从喇叭里听见，自称侯德健的几个人一遍又一遍地呼吁学生们撤离，并说已和戒严部队交涉过。约4时30分，戒严部队指挥部广播说：‘同学们请注意，我们同意你们的呼吁，允许你们和平撤离。’广播了一遍又一遍。”

“约4时50分，纪念碑周围的学生开始撤离了。我看了看四周，几乎没人了，我便和他们一起回来了。当时是5时零5分。

“这就是我当时所看到的全部情况，整个过程没有看到死亡一个人。现在逃到国外的极少数人别有用心地谎称：‘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说什么他们是‘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这纯属无稽之谈。他们妄图欺骗世界上一切善良的人们；诋毁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徒劳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三 从清华园看动乱

1989年8月25日下午，新上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偕同3位政治局委员，来到清华大学参观并和80余名师生代表举行了长达4小时的座谈。他先倾听了师生代表们的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计算机系学生姜峰。

他一开口就自嘲地说：“我参加过绝食，是一个动乱分子。”

江泽民马上问：“谁给你戴的这顶帽子？”

姜峰说：“算是我自己给自己加的吧！”

江泽民说：“谁也没有说过你们是动乱分子。你们年轻人归根到底还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姜峰笑道：“总书记给我摘帽了！”

江泽民也爽朗地笑道：“本来就没有给你们戴过这顶帽子嘛！”

笔者是从清华大学一校内刊物《水木清华》上读到上述报道的，内心为之一动。几个月来，我对北京风波是从社会的角度观察的。如果步总书记的后尘深入到清华大学与师生们攀谈，对这一震惊全球的事件定会有新的理解和体会。

在清华大学的教授和讲师中，我有几位好友，与他们谈起这一心愿，他们赞成我深入到一个学校，但不赞成我选清华，理由是清华大学在动乱中并不是“震源”，没有代表性。我说明无意写清华大学动乱的经过，而是借清华园作为观察

点，透视北京风波的若干侧面。这样，他们就介绍我与几位师生见面，深谈之后，获益匪浅。

风波乍起 打击对象已定

清华大学创办于1911年，至今已有78年的历史，新中国建立后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材，号称中国工程师的摇篮，是中国首屈一指的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现有本科生和研究生13000余名。

清华大学与另一所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靠近。两校之间的骑自行车路程不过10分钟。每逢学潮，清华的同学总是成群结队到北大校园去看大字报，回来后往往夸说：“北大的大字报质量高”。

这次，风波乍起，清华园里在胡耀邦逝世后的3天内，出现了大小字报和挽联88份，来势很猛，但在4月19日前，学生还没有走出校门行动。而4月18日和4月19日，北大学生，后来的“高自联”头头王丹已经带领一批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前请愿，并公然违法冲击国务院新华门，制造了军警打学生的“4.20血案”的谣言，煽动起学生与政府对抗的第一个高潮。

4月19日晚，清华园内有3000余名学生在校内游行，后有1000多人结队去北大，在那里与北大学生一块参加集会。会上传出金观涛的3点“指示”：1.目前形势很好；2.北大要与清华联合起来；3.要进行非暴力请愿行动。到午夜，清华学生才回校。

4月20日，北大派3名代表到清华商谈去天安门游行

事，并于中午在学生食堂门口发表演讲，鼓动同学们去天安门游行。

第二天，出现了一份醒目的《告清华同学书》，全文如下：

“为了配合北大、南开、人大、北师大等高校的统一行动，抗议对学生的暴行，反对暴政，定于今天下午6时30分在第十食堂前集合。”

届时一批学生在食堂前聚集。有人发表煽动性演讲，动员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去，要求参加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胡耀邦追悼会。数千名学生连夜游行去天安门，于凌晨1时30分到达。

在22日上午10时胡耀邦追悼大会举行时，会场外的广场上共聚集了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北航等20余所高校约3万名学生。北京市政府早已发出通告，为了保证追悼会顺利进行，自22日8时起，天安门广场要清场。但数万名学生不顾政府通告，提前进入广场静坐，政府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没有按惯例清场，只要求学生遵守秩序，静听追悼大会的实况广播。

策动学生前往广场的组织者，表面上是“要求参加追悼会”，实质上“陈兵城下”，意在请愿。果然，广场上传出谣言说，追悼会后，李鹏要和学生见面。有人还手提喇叭，煞有介事地宣布“李鹏已答应12时15分与学生见面。”接着学生头头郭海峰等3人，在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下，双手捧起卷起来的大幅请愿书，要求亲手交给李鹏。工作人员表示可以接下来转交，他们执意不交，长跪不起。这出事先安排好的“长跪请愿”丑剧以及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的谣言，在广大学生中煽起对政府的极大不满情绪。

清华学生回校后，一个个怒气冲天，认为政府不把学生放在眼里，与政府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当天就酝酿罢课，理由是请愿不成只有罢课。4月24日，北京40所高等院校6万名学生没有上课。

学潮一开始，为什么矛头就对着李鹏，我长期不解。他担任总理工作时间不长，本人也没有什么严重的缺点引人不满。但是，胡耀邦一逝世，竟传出他是在开政治局会时被李鹏气病的谣言。清华园里贴出大标语，要求李鹏辞职。4月18日，王丹带领北大学生请愿，包括郭海峰跪递的请愿书，有7条要求，主要是：一为胡耀邦“平反”；二否定反自由化。这些要求实际上属于共产党中央处理的问题。为什么绕过总书记赵紫阳，而专找负责政府工作的总理李鹏呢？

清华一位了解内情的教师告诉我：学潮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是很懂得利用群众心理的。群众对党和政府有不满情绪，但模模糊糊，并没有具体的反对对象。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要把他们的不满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去，这叫“聚焦”。邓小平是他们首先要反对的对象，因为他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李鹏为什么是第二个焦点呢？一般学生对他其实并不了解。动乱的策划者早就把他内定为保守派代表人物，说他是1988年开始的经济上治理整顿的倡导者，他的对立面则是主张改革开放的赵紫阳。尽管广大学生对赵紫阳也有不满，但运动的策划者内定“倒李保赵”的方针，所以采取种种手段将不满“聚焦”到李鹏身上。这是有预谋的。

负责与“高自联”联络的清华学生说，4月22日所传李鹏答应出来接见学生又不见完全是捏造出来的，所谓传递这一信息的记者后来提供的录音，证实他与学生代表谈话时并没有说过此事。在广场上散布谣言完全是有意煽动群众的对

抗情绪，而且有意将不满“聚焦”到李鹏身上。

对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来说，打倒李鹏并不是与他本人过不去，问题在于他们认为李鹏是“保守”势力的代表。

学潮初期，在清华园里张贴的一张《我对学生运动的看法》的大字报中，对此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学生运动能够使李鹏下台，这将是其最大的功绩。看来李鹏已经下决心拿中国的命运做一场复活公有制梦的事业，类似的试验在他之前已由许多比他杰出得多的人物做过，并且无一例外地失败。”

这就是说，李鹏是主张治理整顿的，而治理整顿在他们看来就是为了“复活公有制”，而他们所主张的改革开放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在同一张大字报中也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改革就是把公有制改变为私有制，一个社会的财产关系决定了其它一切社会关系，财产制度决定了其它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和制度的。改革而不改革财产关系和财产制度，还能够改什么？中国的全部问题都归纳为这一问题。……”

这张大字报署名为“旁观者”，也许作者不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而是高参式的人物，即便是学生，他也是受社会上竭力主张中国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由化人物的强烈影响的。它点出了幕后策划者的政治纲领：“只有私有制才能救中国”，这是直接与中国共产党所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唱反调的。

赵紫阳 5.4 讲话后局势恶化

4月22日追悼大会之前，党和政府对待学生过激的言论和破坏法制的行动始终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最明显的是召开追悼大会时，事前宣布天安门广场要清场，届时看到三、四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也就让步，但是学生方面得寸进尺，事态越来越扩大，看来不采取果断措施不足以平息日益动荡的局面。

4月26日，《人民日报》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是一场少数坏人制造的“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北京市召开了万人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也于4月26日发表通告，肯定了大多数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合理愿望，指出：“这和社会上某些人要借机制造动乱是不同的。”同时也指出：“近一周来，在同学中也出现了一些过激和错误的言行，希望大家提高认识、吸取教训。”并特别强调：“从现在起，同学们不要和校外非法组织联系，不要参加他们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不要搞所谓‘北上南下’到外地的串联，”并号召按时上课。

学校当局还通过各系教师和学生干部做了大量说服和劝阻工作。但是仍有2000余名学生不听劝阻参加了4月27日的全市38所高校3万多名学生的游行。之后，大部分学生情绪缓和下来，非法“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的一些头头纷纷辞职，“筹委会”也宣布解散。大多数同学有复课愿望，5月5日清华全校正式复课，上课人数达80%以上。学潮和动乱

呈现明显缓和的趋势。如果不是赵紫阳发表公开言论支持动乱，从清华园的角度看，事态是有可能逐渐平息下来的。

5月4日，赵紫阳借会见出席亚洲银行第22届年会的官员时机，分析了国内形势，发表了与4.26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他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等等。

当电视台播放了这篇讲话后，清华园里很多党员、干部、特别是直接做学生工作的教师们立即感到“中央的调子变了”，不少人向学校领导反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晚，几家报社的记者一个接一个地赶到清华，要求见校长和副校长，让校方对赵紫阳的讲话表态。由于他们对赵的讲话有看法，只好婉言拒绝。有的记者打电话给某负责人，要求表态，他推说没有看电视，记者说：“我在电话里念给你听如何？”他回答道：“这么大的事这样办不太严肃吧！”有的记者则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你们不谈，明天报纸上别的学校领导都表态了，你们就很被动了。”他们仍然拒绝了。当时，他们就感到这些记者过分积极，显得反常。

现在已经真相大白。赵紫阳的这番讲话是他的前政治秘书鲍彤一手炮制的。赵紫阳趁接见亚行官员时抛出之后，鲍彤要求电台和电视台立即广播，又要求次日各报在头版显著地位上发表；同时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应，以制造拥护赵紫阳的舆论。那些记者受命到清华来征集“正面反应”，不料碰了一鼻子灰。

记者们也在学生当中广泛收集反应。他们反常的积极性也引起一些有政治敏感的学生的注意，进而猜测党中央出现不同声音，是不是有人在支持他们。低落下去的情绪又被激

发了起来。既然中央有人支持，斗争就可以升级。5月1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把动乱推向新的高潮。

北京大学与清华不一样，自4月23日罢课以后一直没有复课。5月11日，北大又贴出《紧急建议》：

“鉴于目前严峻形势，我们建议破釜沉舟，采取如下紧急措施：

A.集体绝食，具体时间、地点可商量。

B.竭尽北京高校之全力，于戈氏访华之日游行进驻天安门，作最后拼搏，成败在此一举。”

后来，“高自联”头头们经过周密策划，将A、B两项建议合在一起，决定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两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体绝食，并组织大批学生以保护绝食学生为名，进驻广场。

清华大学部分学生在“高自联”统一部署下，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起初，有97人报名绝食，后来增加到200多名，此外，还有2000名左右清华学生在广场充当纠察队和声援团。

清华无线电系一位学生辅导员对我说，他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参加了绝食。这位同学平时功课好，为人正派，参加绝食的确出于单纯的政治热情。辅导员几次突破纠察线进入绝食圈子里劝他停止绝食返校。他表示愿意返校，但身不由己。他说多次举行表决，他都投了停止绝食的票，但“指挥部”最后宣布还是继续绝食。“高自联”的头头吾尔开希说：“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如果有一个绝食的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的其他几千个绝食学生也不离开。”吾尔开希这一荒谬的“民主法则”公开发表在1989年5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

绝食之后，清华大学与其他各校一样，虽未经宣布，实际上又无限期罢课了。学生和教师出于不同目的纷纷向天安门跑，有的是去当纠察队的，有的是去声援的，有的是劝同学回校的，也有的是担心同学身体健康而前往探视的。社会上抱着各种不同目的的人也向广场集中。天安门广场一时间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中心。就这一点而论，策划绝食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当时，社会上人们普遍的心理是，学生绝食无非就是要求对话，政府领导人就出来见见学生，事态不就可以平息了吗？抱着这种心情，有人签名向中央发呼吁信，也有人参加声援游行，这些人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对此，前文已经写过，来到清华园以后，听听与学生头头有接触的师生们的体会，就认识得更深刻了。

有一个清华学生的头头亲口对我说，要求与政府对话不是“高自联”头头的真意，不过是用来引起号召群众的效应罢了。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谋求与学生对话，“高自联”一方往往一再提高条件。有一次，他亲自参加与中央统战部的阎明复部长交涉对话，一切都谈妥了，王超华（“高自联”头头）突然提高条件，必须要赵紫阳和李鹏亲自到绝食同学中来。他当时就感到，条件未免太苛刻了，政府难以办到。“高自联”对话实际是毫无诚意的。

在这之前，4月25日清华大学学生代表要求与政府对话。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教委副主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等人从下午2点等到4点15分，学生代表未到。后来报纸公布，原因是要求对话的学生对谁当代表意见不一，争执不下，派不出代表。这次到清华才了解到，不是这么回事，而是“高自联”不同意清华大学学生单独与政府对话。

集体绝食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派人与“高自联”头头接触，也请来了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目的是从中“斡旋”以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停止绝食的方案。清华大学一位教师也参加了这次聚会。他对我说：“通过这次非正式的‘斡旋’会，我发现‘高自联’头头政治纲领很明确，态度很强硬，做法也很狡猾。与这伙人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

在这次聚会中，首先谈的是对话。关键是讨论对话中要谈什么问题。

“高自联”要谈的是两个问题：一、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二、承认运动中产生的非法组织。这两条政府要坚持原则的话，是绝对不能让步的。

在那次所谓“斡旋”会上，有人提出：既然“高自联”要否定《人民日报》社论，能不能采取变通方式，譬如让《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一篇社论，对学生爱国精神多加肯定，行不行呢？“高自联”头头断然否定。他们提出：一定要追查“制造”社论的人，谁对4.26社论负责，谁就要下台，否则就不答应。

那位参加‘斡旋’会的教师对我说：“一听这种论调，我就明白了，他们表面的目的是对话，实际上是否定社论，让一般群众听来好似都是很简单的要求，为什么政府不答应呀？实质上，他们后面藏着的目的是要求中央一些领导人下台，并且要求非法组织合法化，为建立反对党铺平道路。阶级斗争是无情的。好心人把学潮天真地看作是青年学生爱国热情的表现，而看不到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确实是把复杂的事态看得过于简单了。”

国内外反动势力纷纷插手

5月13日集体绝食后，清华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后在思想和情绪上起了质的变化。如果说大多数人在此之前参加游行和罢课，仅仅是出于对政府某些不满的话，进入广场之后，政治参与感就强烈起来了。一个个议论起时局和党内党外政治舞台上的事件，如数家珍，非常起劲。此前，学生头头的政治纲领，也就是这次学潮要达到什么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一般学生则不尽然；而进入这一阶段，普通学生也讨论尖锐的政治纲领了。这是由于广场上除学生外，社会科学界、新闻界、文艺界……等各种人物都聚集拢来议政，相互影响，推波助澜。广播喇叭整天播放各种信息和谣言。更重要的是，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趁机插手，事态越演越复杂了。最不正常的是党中央决策层的分歧完全暴露在广大学生中。用学生的话说，他们有“天线”。通过“天线”传递下来中央的机密和别有用心的人的指示。

从上面传给“高自联”头头的还有党中央即将采取行动的预告。5月17日，清华自治会“筹委会”接到一个自称是中央机关的人打来的电话，传递几个信息：一、戈尔巴乔夫走后，李鹏将接见学生；二、赵紫阳已辞职；三、两天之后，北京实行军管，军队已向北京调动。后来“筹委会”接电话的人又接待了自称是教师的人，传递了同样的信息。接着，北大自治会“筹委会”也打来电话，说同一内容。接电话人从不同途径得到相同信息，认为可靠，立即将消息传到广场指挥部。

中央的机密落到动乱策划者的手中，后果之坏在意料之中。5月19日夜，“高自联”和“工自联”由此得以调动人马到

各路口阻拦戒严部队进城。

5月16日，有自称与上面有联系的人到清华找非法组织的头头们了解情况，提了许多问题，如：绝食学生中有人死亡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赵紫阳下台会怎么样？……当天他只做调查不传信息，约好两天之后再回来。到5月18日，此人果然又来了，带来了4条建议，望他们传给“高自联”。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学生提：鉴于邓小平年事已高，请他保持晚节，光荣引退！

这条“建议”与“美国之音”遥相呼应。戒严之后，“美国之音”借某评论家之口说，中国学生进驻天安门广场之后犯的最大错误是把矛头对着邓小平，看来邓在军界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高自联”头头对来自上面和外面的“指导”，心领神会，所以5.20戒严之后打倒邓小平的口号销声匿迹，叫得最响的口号则是“打倒李伪政权”。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先扭着李鹏一个不放，集中目标有可能先达到目的。

国外反动政治势力的渗透，在北京大学表现最为明显，在清华园也有所反映。

4月22日，学潮还在兴起的初期，就有两个自称是记者的美国人找清华学生“领袖”谈话。他说，我和华盛顿通过电话，我们是支持你们的。现在中国政府很忧虑，北大学生已经有组织，你们也要建立起组织，有了学生自己的组织，中国政府就会更加忧虑。……从他的谈话内容看，完全不是进行新闻采访，而是表示支持和出主意，看来是政治背景复杂的美国人。

从5月下旬动乱升级之后，清华“筹委会”每天晚上定时接到来自香港的电话，说话人自称是陈小姐，但口音常常变

换，看来是某一组织的代言人。电话内容无非是三条：一、询问北京学运新情况；二、通报中国各大城市以及香港、东南亚、日本、美国甚至欧洲各大城市对中国学运的反应；三、表示支持，声称你们要什么，他们都会想办法提供，云云。

“高自联”得到海外大量金钱和物资是众所周知的。清华“筹委会”就得到二十儿万元。

为什么卷进动乱？吸取什么教训？

广大学生参加游行罢课的动机究竟是什么？经过这次动乱之后他们得到什么教训？带着这两个问题，我在清华大学找了一些同学谈话，也看了不少同学写的心得体会。

先让我引一段前面提到的参加过绝食的计算机系学生姜峰在《水木清华》上发表的短文——《50天后的断想》。

“我同许多同学一样，经历了这50天的风风雨雨，还参加了5月13~19日的绝食，算得上满心满腹地投入了我们想象的‘民主运动’了。50天的风波已过去两个月了，情绪的大起大落终于趋于平和。这时候静下来回忆回忆，思考思考也许正是时候。

“学潮由悼念胡耀邦引起，却没有停留在悼念上。开头送花圈的游行便提出了《七条》请愿，出乎我们的意外，觉得有点蹊跷。但后来说得次数多了，看看‘反官倒、反腐败’的要求是符合我们心愿的，看看‘加快民主化进程’的口号是我们一直想说的，看看‘新闻立法，加强舆论监督’的提法也是大家同意的，我们习惯了，

同意了。到3个学生下跪时，更是跟着流泪了。事情发展到这里，理智也好、冷静也好，都难以淹过情绪的波涛。情绪的闸门一经打开，行动便难以以我们本来便十分单薄的意志为转移，也难以以我们个人善良的意愿为转移了。人都似乎到了另一种境界，风声一起便闻风而动；谣言一出便跟着瞎跑。到了这一步，我们善良的意愿都难以对自己负责了！

“‘4.26社论’出来后，便一直听到‘一小撮一小撮’，听到‘极少数极少数’，心里有点担心了。但又总闹不清他是谁，他们是谁。相反看到的都是身边那么多真诚正直的同学，想到的只是抑制不住的满腔激情。仅仅20多岁的我们，谈不上任何政治经验，更谈不上有一个坚定的政治方向。20多岁一切都还在形成中，一切也都还在磨炼中。可是这些年来‘立场不提’了，‘阶级没有’了。50天里，我们甚至想都没有想过那一小撮正是自己的敌人，想都不会想过极少数代表什么阶级。

“到了收听陈希同在人大常委会上的报告后，我是真的给惊呆了！琢磨了半天的‘一小撮’出来了，想不出来的‘极少数’露了脸。摆在面前的件件事实，显而易见的这场风波的主要矛盾，一时间把我们那份简单的热情、那份单薄的意愿反衬得那么不足道，把我们的无知、轻狂、幼稚透射得那么清楚！这一切叫你那么不敢想象，不愿承认，可事实摆在那儿，终究你得接受，你得思考。”

这篇短文把参加游行、罢课、绝食的普通大学生的心情写得十分真切，从中可以体会到不少问题。

看看“反官倒、反腐败”的要求是符合我们心愿的，看看

“加快民主化进程”的口号是我们一直想说的，看看“新闻立法，加强舆论监督”的提法也是大家同意的。他们参加学运的初衷的确是出于对腐败官倒和分配不公的不满，又有要求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愿望。与我谈话的其他同学也都是这么想的。

那么，事态的发展为什么走向青年学生良好愿望的反面？这里确有深刻的教训。

姜峰说：50天里，他看不到自己在受着一小撮坏人的利用。大学生都很自豪，以为自己有头脑，能独立思考，说他们被一小撮人所利用，觉得受到侮辱。从感情上和理智上都不愿意承认被坏人所利用的严酷事实。这些年来，阶级斗争的观念在广大青年学生头脑中已不存在。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动乱和暴乱平息之后，大量事实被揭示出来，他们出了一身冷汗。头脑一清醒，再回顾运动中自己亲身经历，想到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他们才真正明白是被坏人利用了。

水利水电系的一名学生说：5月13日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当晚，中央和北京市领导人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就到广场上去和同学们对话。但是他们一张口，就被身份不明的人用粗野的语言打断，然后鼓动大家起哄，把领导人轰走。当时，他就想，绝食目的之一就是要求和中央领导人对话。中央领导人来了。为什么又不对话呢？当时仅有一点不明白，也有一点反感。如今回想起来，这是坏人在故意捣乱。

他还回忆起，5月18日到广场当纠察，就站在“高自联”广播站旁边，传递群众送来的稿件。他看到凡是劝说、说理之文，一递到里面，一律胡乱扔掉，而一些所谓社会

“精英”的煽动性讲话，接到之后，如获至宝，反复播放。当时，他只是觉得这些人太不民主，不讲“新闻自由”，现在看来他们本来就居心不良。

一名数学系的学生回忆起“高自联”头头曾说：“我们一切行动要听联络员的。”所谓联络员就是政治背景复杂、与中央有联系的人。一名计算机系的学生说：他和四通公司子公司——华成公司有过来往。他们向“高自联”提供一笔经费和一批物资（电动打字机、复印机等），交换条件就是按四通公司提出的口号组织一次游行。5月25日“高自联”果然组织了一次游行，口号是由四通公司子公司华成公司拟定的，除“拥赵倒李”而外，还有“欢迎万里回国”的口号。当时四通公司在其总裁万润南指挥下，就是要策划社会各界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万里提前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

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学生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行动十分猖獗。在高潮时期，学生们头脑发热，无论从哪方面来的“支援”一概收下，毫不在意。如今想来，领下人家的钱和物，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行动的呀！

我还和同学们讨论一个问题，运动期间，在清华园里出现许多政治性非常强的大小字报，其内容远远超出反腐败反官倒和促进民主化进程的范围，譬如早在4月19日，有一张《我们的目的、口号》的大字报，公开提出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反对共产党专制……等等。这实质上是与宪法上规定下来的四项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又如5月4日左右张贴的题为《腐化的根源是虚假的公有制》的大字报，公然提出打倒公有制，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据说，一般反腐败反官倒的大字报，看的人并不多，而这些带有政治纲领性的大字报看的人特别多。这是什么原因？

他们说：从内心来说他们是拥护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但感到共产党有失误，使得国家进步慢，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只要有能使国家繁荣富强的办法，他们都感兴趣。学生们就是抱着这种心情去看这些大小字报的。

这使我想到了，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尽管有朴素的爱国热情，但一个时期以来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引导。相反，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的思想文化，但又食洋不化。通过报刊、座谈会、研讨会、文化沙龙……等等渠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广泛传播，如私有制如何美妙，政治多元化多么合理。许多人误以为把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国就能兴邦强国。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仅有朴素的爱国热情的学生，不能不被一小撮打着改革旗号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利用。

我与他们平心静气地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表示能够接受并说现在已逐渐认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的危害性了。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共同吸取的深刻教训。

离开清华园前，我拜访了老友，一位在清华大学执教30余年，并担任过副教务长的老教授。在他四壁布满书橱的斗室里坐下来，边听他的滔滔宏论，边翻他的藏书，既随便又愉快。

我发现书桌旁矮台上有一摞讲义夹，翻开一看，原来是他多年积累下来讲课的“教案”。字迹工整，表格也画得如同印刷出来似地整齐。引起我兴趣的是正文之外用红笔写的警句，有的是马恩语录，有的是带哲理的格言。

我问道：“你讲的又不是政治课，为什么引这些政治性论述？”

他说：“老兄，你有所不知，育人首先要育德呀！我在讲

业务课中随时向学生宣讲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治学方法。”

我了解他说的是真心话。他一贯主张中国的大学要培养有正确政治方向，并有业务专长的人材。考进清华大学的学生应该说都是上等的“料坯”，必须“精雕细凿”方能成材。对学生既要热情爱护又要严格要求是他的信条。我见过他的一名学生，现在已经当了干部，是既有才华，又有为国为民献身精神的优秀青年。从他身上我看到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德才兼备青年的典型。他谈起我的老友时说：“老师对我批评起来毫不留情，但事过之后，对我还是那么好！”

是呀！我想从这次风波中应该吸取的另一条重要教训，就是对青年要严格要求，决不能一味吹捧，这样很容易让他们身上固有的弱点恶性膨胀，以致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当代青年人有爱国热情，但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们有民主意识，但缺乏民主素质和法纪观念；他们有参预要求，但缺乏参预社会事务的能力和 political 经验；他们有自立的愿望，但缺乏实事求是自我解剖的精神。另外，现代大学生，不少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进入大学后，造成一种“社会宠儿”、“天之骄子”、“民族精英”的潜意识，自以为是多，自以为非少。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大学生这个弱点，猛吹猛捧，吹得他们冲昏头脑，不知天高地厚。这是他们在学潮和动乱中被坏人利用越陷越深的一个内在原因。

江泽民总书记在清华大学座谈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中说：“我再三讲，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对青年一要满腔热情，二要严格要求。”

我想，不仅清华师生，全国各大学广大师生对此都是乐于接受的吧！

四 与北京相呼应的上海动乱

北京风波并不局限于北京，波及全国。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84 个大中城市的 600 余所高等院校，有 280 万人次上街游行示威。

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动乱规模之大，影响之坏仅次于北京。

《世界经济导报》首先发难

上海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世界经济导报》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扮演了很不寻常的角色。学潮之初，《导报》利用舆论阵地首先向党中央发难；它的反常行为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批评，而且编辑部被整顿之后，它又以“受害者”面目四处招摇，与敌视政府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与北京南北呼应，在上海制造动乱。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极少数阴谋分子利用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对胡耀邦的悼念之情，策划、组织和发动了政治动乱。《导报》编委、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在他的工作日志中写道：“胡耀邦逝世，是一个很好的转机，是可以改变当前情况的转机”。当日，张伟国即与北京《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以及苏绍智等人联系，“打听有关人士反应。”戈

扬当时就造谣说：“耀邦是被气死的！改革者竟如此下场！”4月19日，《导报》与《新观察》联合召开“追悼胡耀邦同志座谈会”。《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在此之前从上海“指示”：“内容要有份量，不是一般表态性的。”参加者名单当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座谈会上，几个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发言。他们不顾事实真相，煽动说耀邦“受到不公正待遇”，他的辞职是党的历史上一大“悲剧”，甚至死了连“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号也没有。他们要求重新“对耀邦作出公正评价”。他们公开翻“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案，说什么“反自由化运动”甚至在最基层的人民当中也“不得人心”。有人还提出：“要对1986年的某些运动作出公正的评价”等等。

李鹏在分析动乱初期的形势时指出：“这个时期，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正是《导报》召开的这个座谈会，首先鲜明地、集中地提出了这两个政治纲领。

围绕上述政治要求，这些人在发言中公开地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和党中央。他们诬蔑邓小平已经忘了人民、脱离人民了。严家其更向党中央要挟道：“要无私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承认错误，重蹈覆辙就在眼前”。戴晴（《光明日报》记者）则大谈中国共产党70年的历史，大谈几位总书记的命运，说什么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暗示现在要全力“保”赵紫阳。一句话，“倒邓保

赵”。

当时，学潮已起。座谈会上有些人竭力鼓动学生和群众进一步走向街头，说什么“中国的凝聚力”在天安门广场，“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天安门广场。他们以学者、名人的身份给学潮火上加油。

对这次座谈会，钦本立等人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做法：指示张伟国详细整理所有发言人的讲话，准备以几版篇幅全文发表；决定《导报》提前一天付印，赶在胡耀邦追悼会举行那天把报纸发往北京；把报道方案预先捅到海外。于是，海外一家报纸在座谈会前两天，即4月17日就透露：《导报》将用专栏形式报道这次座谈会的重要内容。

上海市委宣传部从海外报刊上获悉这个信息后，由市委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于4月21日下午约见钦本立，要求看清样。第二天市委负责同志看了清样后，立即再约钦本立谈话，诚恳而又严肃地指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与中央正式决定相悖的意见是宣传纪律所不允许的。尤其在当前学生已经上街的情况下，这个座谈会的部分发言内容如发表出去，会起到错误的舆论导向作用，对稳定当前局势不利。因此，市委负责同志从维护大局出发，也是为了爱护《导报》，建议删节数百字，主要是严家其、戴晴等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言内容。但钦本立坚持不肯删节这些反对党中央和邓小平的语句。当领导同志追问他为什么要坚持发表这些内容时，他一语道破天机：“我就是想邓小平检讨。邓小平早检讨，早主动，早得人心。他要检讨，我们就拥护他。”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亲自找钦本立谈话，严肃批评了钦本立的错误观点和无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的行为，指出这些内容非删节

不可；同时请担任《导报》名誉理事长的一位老同志一起做工作。这样，钦本立最后总算同意删节了。可是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实际上，他在将清样送市委审阅的同时，就已下令开机印刷刊登这次座谈会内容的439期报纸了。所以，当钦本立在与市委领导谈话以拖延时间时，16万多份报纸已经全部印好，并有几百份提前抢送和抢发出去，有的已送往北京了。

市委宣传部得知后，于4月23日下午与钦本立商定：这期刊有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导报》（称做A版）停发，另编B版。按理，这种有限篇幅的改版半天就可以了，仍可保证《导报》如期正常出版。但是，此后整整3天过去了，439期B版仍未付印。在此期间，市委宣传部多次打电话催促，但始终找不到钦本立及有关编辑人员。现在真相大白：原来4月23日晚钦本立在家中召开编委会，一些编委反对出B版，坚持继续发行A版，最后钦本立总结发言说：“我本来就认为没有什么错。这些删去的内容正是我们报纸要说的。”于是，他们又电告在北京的张伟国把这个消息捅到海外新闻单位去。果然，4月24日香港《南华早报》首先发出《导报》被“查封没收”的歪曲报道。24日晚，钦本立在家中再次召开编委会，决定给上海市委写一份《紧急报告》，接着，他就躲到樱花渡假村“养病”去了。正如他们私下向香港《明报》透露的：“能多拖一天，就是《导报》的胜利”，“《导报》事件已形成国际影响了”。就这样拖到了4月25日晚上，《导报》编辑部就写了一份《紧急报告》送到了市委。报告说鉴于A版问题已引起国际上强烈反响，同时造谣说：“据北京消息，中央有可能对耀邦同志重新作出结论”，因此，坚持要发行A版，企图用国际的和“北京”的压

力，迫使上海市委屈服。这份《紧急报告》是“专此奉告”，这就是说他们要一意孤行了。

上海市委根据4月26日《人民日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精神，果断地作出关于钦本立停职和整顿《导报》的决定。4月26日下午，上海市委召开“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万人干部大会，江泽民在会上宣布了市委的决定，并义正词严地指出：“当前，有人企图利用海外舆论，对我们施加压力，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也决不能动摇我们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心。”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拥护与支持。

钦本立和《导报》某些负责人在439期问题上坚持错误并不是偶然的失误，有其历史根源。

《导报》创办于1980年，创办之初曾按照办报宗旨宣传改革开放，发表过一些好的文章和报道，为政府提供过一些有益的见解，因而在社会上获得好评。可惜好景不常，钦本立等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下，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由共鸣发展到迎合，由迎合发展到倡导，以致越陷越深。

《导报》近年来在经济报道上竭力鼓吹私有化。翻阅它的版面，赫然在目的标题是《国有制在世界范围走到了尽头》、《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国有制往何处去？》、《国有财产个人化——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与选择》等等。《导报》报道了一个所谓“国有制危机理论研讨会”，公然提出“国有制已到了最后被否认的阶段”。“今后的出路是民营化、私营化”。主张私有化的文章宣称：“试了各种方案，就是不敢试被全世界上百个国家数千年历史所证明最有效最简单的一个方案——私有制”。对上述公然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的主张，《导报》竟称之为“真知灼见”，“令人耳目一新”。

一个时期以来，《导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排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如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权力多元化为原则”；“改革之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志在于是否出现了某种制衡的格局和多元化的政治”；“经济多元化，是政治多元化的基础，是现代政党的基础”。弦外之音是，既然存在私有经济，也就应有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派别和政党。这些都是为建立反对党制造舆论的。

总编辑钦本立对境外报纸发表谈话时提出过“淡化党的领导”，“必须改变党领导一切”的主张。当钦本立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受到批评时，仍固执己见地说：“对党不能领导一切，我仍这样看。党难道能领导太阳吗？”他的那种急切想摆脱党的领导而按捺不住的心态表演得相当充分。

1986年以来，我国出现经济过热现象，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针对过去几年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某些严重失误，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尤其是赵紫阳身边的一些智囊人物，预感形势不妙，便利用国内外，境内外传播工具，竭力反对治理整顿方针，透露出“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

与赵紫阳智囊团关系极为密切的《导报》，此时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散布治理整顿必然导致经济“停滞”、改革“逆转”的言论；并攻击李鹏在七届二次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歪曲这个报告只谈治理整顿，不谈改革。1989年年初，《导报》又异乎寻常地全文转载了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的严家其与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关于时局的对话》。严家其在这篇《对话》中毫不掩饰地说：“我觉得

应当直截了当地把对中国前途的这种担忧说出来”，“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这篇《对话》显然是为了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

《导报》早在学潮和动乱酝酿阶段就积极参与了制造舆论，因而在学潮乍起就发生了所谓《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如今看来与其两年来的表现一脉相承，合乎规律，毫不奇怪。

北京刮什么风，上海下什么雨

这次动乱的中心和主战场在北京，上海是与之遥相呼应的分战场。京沪两地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通过聚集了赵紫阳“智囊团”人物的北京“三所一会”（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以及两地“高自联”组织和学生南下北上的频繁串联等多种渠道，策动上海“与北京联合行动”。在整个学潮和动乱过程中，“北京刮什么风，上海就下什么雨”。

学潮初期，北京高校出现许多“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口号，上海高校也如法炮制，亦步亦趋。《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发表后，在方励之等人授意下，北京“高自联”立即发出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口号改成为“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上海在同一时间，也以“上海高校学生联合会”名义，在复旦大学贴出一张《通

告》，统一规定游行时多提物价、官倒，“绝对不提打倒官僚政府之类的口号”。

当这次学潮和动乱初起时，由于上海市委、市政府于4月17日就旗帜鲜明地发出《通告》，提出“要严防坏人借题发挥，挑起事端，进行破坏活动”；又由于全市50多所高校的干部、教师以及社会力量，全力以赴地做好稳定工作，赢得了主动。在5月4日以前，全市51所高校、13万大学生中，仅3所高校、四、五千人上街，教学秩序基本正常。但是，5月4日以后，风云突变，赵紫阳在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的讲话，使形势急剧恶化。学潮和动乱以来，坚持上课的大多数学生和积极向学生做工作的大多数干部、教师感到泄气。如5月4日以前局面一直比较平静的交通大学，许多学生在收听了赵紫阳在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的讲话当夜就议论纷纷：既然上街游行是“爱国运动”，那我们不上街的是不是就不爱国了？而那些搞动乱的人则从中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气候，从而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

这一时期，上海的学潮出现了两大特点：一是紧跟北京、声援北京；二是学生与《导报》互相声援，共壮声势。市“高自联”的头头们在5月10日下午策划组建上海高校学生“赴京请愿团”，并为此于1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请愿团主要任务是“质问国务院，《世界经济导报》错在哪里，什么叫总编负责制”等。请愿团到北京后，立即同北京“高自联”头头王有才等接上了头。为了加强同北京“高自联”的联系，上海“高自联”向北京派出了联络员，每天把北京的情况传到上海，把上海的情况传到北京。从那以后，北大“三角地”广场就经常可以看到上海学生行动的海

报。

5月15日，上海学生从赴京请愿的代表那里获悉北京学生于13日开始静坐绝食，立即采取了两项“策应”行动：一是请愿团派其中5个人立即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绝食，余下的人继续去北京各高校联络、演讲、递交请愿书。二是复旦、华东师大、同济等校马上贴出倡议书，号召上海学生也进行绝食行动。5月16日晚，成立了“上海高校绝食团”，50余名学生在市政府门前宣布绝食。5月17、18、19日连续3天，参加绝食的学生最多时达300多人。

与此同时，上海高校又陆续有大批学生到北京去串联，并参加天安门广场绝食。仅上海工大，这一时期进京串联学生就达102人。5月19日下午，上海高校有人在与北京“高自联”头目王有才电话联系中，获悉当天晚上李鹏要发表讲话，北京要实行戒严，“消息来自上面，绝对可靠”后，立即随着北京“高自联”这根指挥棒，开始作绝食“降温”的准备。中央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使上海“高自联”极少数人感到靠绝食来加剧动乱的阴谋已彻底破产，于是一面通知绝食学生撤回，一面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激烈的对抗行动，在上海掀起了一股反对北京戒严和妄图推翻合法政府的反动浪潮，促使动乱进一步升级。

一是连续不断地组织大规模示威活动。5月21、22日，上海高校的少数人连续在复兴公园聚会，密谋近期“要不断地、持续地交叉游行”，即组织各校轮流上街，学生也分批上街，保持声势，保存实力；提出“近期目标，要李鹏下台；远期目标，实行多党执政”；并决定正式成立“上海高校自治联合会”。

5月23日，华东师大“学生自治会”头头在该校共青广

场的千人集会上说：“北京的学生现在心力不济，我们上海学生要多分担一些，要把学运的重点转移到上海来。”就在这时，“北高联南下宣传团”、“特别行动队”等纷纷窜到上海。“南下宣传团”头头赵文利（女，西北政治学院法律系88级学生）先后在上海工大、铁道学院、复旦、交大作了多次煽动性演讲，谩骂中央领导同志，说：“‘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希望上海的学生坚持到底，复课无疑是对北京最大的背叛！”，此后，这种说法便成为上海学生的“统一口号”，并连续组织了长达9天的游行示威。

二是配合北京极少数人策划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以达到“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的阴谋，由复旦、华东师大、同济、交大4所高校的“自治会”头头决定，5月25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所谓声讨大会。会议策划者说，召开这次大会，是“要趁万里在上海之际，让万里知道上海学生不满，要求尽快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党中央紧急会议，罢免李鹏，为学生运动正名、定性”。当天晚上，交通大学“自治会”召开有2500人参加的大会，上海教育学院的一个教师作了题为《万里回国后的形势和对策》的演讲，煽动学生“要围绕人大常委会的召开，进行呼吁，形成广泛的政治力量”；“这次人大常委会应有市民和学生等各阶层代表参加，这是他们应该争得的权利”；“学生要向人大常委会委员作思想工作，让常委会了解学生运动真相”等等。同一时间，复旦有人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写信，鼓动各地“人大常委会委员马上进京”，迫使“改组政府”。

三是配合北京极少数人阻拦戒严部队进城的阴谋活动，在上海堵塞交通、破坏经济。上海动乱的制造者们在北京部

分地区戒严后多次秘密召开会议，商定“万一上海军管就上街堵交通，造成事实上的罢工”。5月22日凌晨，华东师大“自治会”头头以“今晨5时部队将进入上海实行军管”的谣言为由，紧急集合六、七千名学生，于清晨4时分别占领了苏州河上5个桥头，使市区5条南北主要干道被堵塞2个多小时。5月24日凌晨4时，复旦大学1500名学生也前往5条路段以静坐方式堵塞交通，前后4个多小时。与此同时，上海“高自联”还组织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分头到全市各主要工厂企业进行煽动性宣传，企图挑动工人举行罢工。但全市各企业的干部、职工，对这些煽动和挑唆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四是组织“空校罢课”，对抗李鹏提出的“无条件复课”的要求。由于上海各高校坚决贯彻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的精神，对学生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各校大多数学生陆续返校上课，少数人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5月28日下午，上海“高自联”按照天安门学生游行指挥部的指令，又挑动数万名学生配合所谓“全球华人大游行”，在人民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北京“南下宣传团”成员在集会上发表演讲。上海“高自联”头头在会上宣布：上海高校学生从现在起“空校回家”，造成“事实上的罢课”。5月29日，上海“高自联”向全市51所高校发出“空校公告”，鼓吹“空校是最彻底的罢课”，“是对李鹏所说的‘无条件复课’的最强烈抗议和无声的否定”，“是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精彩插曲”；空校“将发扬播种机的作用，扩大这次民主运动的影响。”

短短几天内，市“高自联”发起的“空校罢课”活动迅即波及到大部分高校，给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和上海高校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干扰。不少高校除毕业班外，其他年级

的学生成群结队，匆匆离校。

各种势力纷纷介入

上海的这场动乱源于学潮，很快演变成动乱，同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纷纷介入是分不开的。上海作为旧中国的“冒险家的乐园”，作为“四人帮”的老窝，有一些“静观待变”、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有一些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而又搞政治阴谋的人，有一些“四人帮”的残渣余孽，他们从学潮一开始就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机，是可以改变当前情况的转机”，而迫不及待地介入进来。以4月23日《世界经济导报》的介入为标志，动乱便迅速向全社会扩散，演变成为一场社会动乱。

《世界经济导报》是上海这场社会动乱的“策源地”。他们声称：“在学潮中，《导报》应作为运动的主角身份发挥作用，要将自己的旗帜打出来，研究怎么改变中国的制度”。为此，他们一方面利用439期《导报》事件，多次召开所谓“新闻发布会”，煽动学生和新闻界声援《导报》，以“保持长期的压力、推进的势头”；一方面利用该报驻京办事处，随时把北京动乱情况传回上海，如本阶段北京动乱者的目标是什么，有些什么主要动向，严家其、方励之等发表了什么意见，中央领导对动乱以及对《导报》的看法有什么不同等。然后，《导报》的一些人就通过翻印散发有关材料，到高校去演讲、与动乱的组织者个别串联等方式，把有关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导报》卷入上海这场社会动乱的程度，从复旦大学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写信“感谢”《导报》老师的“宝贵指

导”和“高自联”的“最新消息找《导报》，理论指导找《导报》”的自白中可见一斑。

上海理论、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等战线，有那么极少数人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同国外的反动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同北京参预策划、组织、指挥暴乱的幕后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这次动乱中也上窜下跳，极为活跃。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王若望在这次上海动乱中，几次三番上街游行，多次接受境外记者采访，还频频向境外报刊投寄支持动乱的文章。学潮初期，他得意洋洋地对人说：“你们看，可有好戏看了，我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5月份尚未到，在4月份就掀起了这样的浪潮，比86年的学生运动更成熟了，这次事件肯定是全国性的，肯定会产生出一个新的转机”。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王若望急忙为香港一家杂志撰文，攻击社论是“中共领导层迈向自取灭亡的病危通知书”。5月中旬，北京和上海部分学生绝食，王若望煽动说：“我不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而且是绝食的老祖宗，一生绝食4次”。他参加游行时身披条幅，胸前写着“铁石心肠，可悲可叹”，背后写着“救国救民，救救学生”。王若望还说：“有人担心，这一来共产党被打倒了，中国没有干部了，今后怎么办？其实这是多此一举。严家其、方励之等都是政治家，现在又涌现多少象王丹、这样年轻有为的接班人，还有赵紫阳这样的人嘛！”他还暗中排列组阁名单，提出：“学生运动胜利后，要同知识分子组成集团，召开国家会议，修改宪法，组织联合政府”，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

以王若望为代表的极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还

挑动和裹胁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多次走上街头为学潮和动乱火上添油，推波助澜。一些新闻单位、理论研究部门、群众团体以至个别党政机关的少数人，也打着横幅上街。各种“呼吁书”、“公开信”也频频出台。上海作协也有那么几个人，在王若望的蛊惑和策动下，着手起草《向世界各国笔会的呼吁书》、《给全国作协及人民的通电》，企图利用国内外舆论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一时间，种种极端反动的观点公开散布，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政治谣言广为传播，各式各样践踏民主、破坏法制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到处蔓延。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次动乱中，上海还有几个身居党政机关要职的共产党员，公开同中央对抗。在5月19日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后，钦本立策划起草了所谓上海市的共产党员《致中共中央公开信》，提出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收回李鹏5.19讲话”、“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立即解除新闻封锁”，同北京“三所一会”的活动遥相呼应。这份《公开信》复印数百份散发至上海市新闻、理论、文化、高校、企业广泛征集签名。它一出笼就受到上海广大共产党员的抵制，指责这种行径是唯恐天下不乱。但策划者们还是急不可待地通过香港报纸发表了消息，并公布部分签名名单，在海内外造成恶劣的影响。

动乱期间，一些“四人帮”残余分子得意忘形。他们私下里议论说：看到“现在这种形势，我们‘造’字头心里不晓得有多高兴！”，“这次搞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们相互庆贺“要改朝换代了”，“出头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还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和煽动闹事，妄图“出来撑一下局面”。据现在初步掌握的情况，上海市“四人帮”残余分子在动乱期间乘机公开活

动的有 35 名，其中，公然跳出来煽动工潮的就有 11 名。

上海的一些社会渣滓在动乱中先后拼凑了 14 个非法组织，后来凑合成所谓“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提出了所谓“组织工人罢工，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李鹏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纲领”，并与上海“高自联”勾结在一起，纠集社会上的一些乌合之众，游行、演讲，发传单、造谣言，进一步煽动和制造动乱。

为了将这伙社会渣滓劣迹曝光于众，特举数例：

——5月18日，在“声援”学生的一片喧嚣声中，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率先亮出了“上海工人联合声援团”的旗号。这个非法组织的发起人中有 4 人有前科劣迹：一个曾因盗窃被判 3 年徒刑；一个曾因流氓罪被判 3 年徒刑；一个曾因奸淫幼女劳教 1 年；一个曾因流氓罪被起诉。这伙人曾组织数十次示威游行和静坐请愿。其中一次是得知江泽民将在上海展览馆接待来沪访问的戈尔巴乔夫的消息后，组织了千余人队伍前去示威。

——5月19日，在外滩市政府大楼门口出现了一个冒充王震孙子的人，发表反动演说。实际上他根本不姓王，真名叫蔡朝军，是一个曾被公安机关拘留过 3 次，劳教过 1 次的人。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担任了“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总指挥，伙同一伙歹徒制定了所谓“推翻当今腐败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纲领。他多次在外滩、人民广场、复旦大学发表反动演讲。

——5月23日，人民广场上冒出一个“民主自由之声”广播台，传播“美国之音”，并炮制谣言，攻击政府，诬蔑社会主义。这个非法的广播台为首的是一个现行犯罪分子。此人叫朱福明。5月15日，朱犯与一个

在麻将牌台上搭识的女人勾搭成奸后，得知这人身藏外币，即起歹念。时隔3天，朱犯再次与这女人鬼混时，就将她活活勒死，劫得美金和其它财物。不几天，他就骑车到人民广场去高喊“捍卫宪法，争取民主”了。

——5月24日，在市总工会对面的外滩码头上冒出一个所谓“上海爱国工人声援团”。这个组织的总指挥曾因贩卖黄金被公安机关拘留过，副指挥曾因参预诈骗被公安机关收审过。在6月3日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后，这个组织的骨干分子严廷贵（曾因赌博和流氓活动被公安机关处理过2次）提出了绑架上海各大工厂厂长的计划，妄图胁迫厂长们下达罢工命令。

——6月7日，所谓“上海工人自治声援团”秘密集会，妄图垂死挣扎，被民警抓获。这伙人的头头绰号“海龙王”，曾被劳改1年。这个非法组织另有3名核心人员都是因侮辱妇女、流氓斗殴面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的对象。

.....

黄浦区和铁路局是上海动乱中闹事最厉害的地方。据黄浦公安分局和铁路公安分局的统计，在动乱中他们抓获的犯罪分子，有前科劣迹的社会渣滓分别占46%和50%。

这些社会渣滓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混进青年学生队伍，煽风点火，或造谣惑众，或搞打砸抢烧，其目的就是颠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自视甚高的青年学生竟与这伙社会渣滓在动乱中结成“联盟”，不能不说是他们的悲剧。

工人纠察队出动

6月3日晚，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反革命暴乱。消息传来，上海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们乱了阵脚，躲的躲，逃的逃，也有的象输光了的赌徒那样孤注一掷，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将上海这场动乱推向极端。

他们首先利用平暴初期北京有几天信息不畅的机会，大造反革命舆论，歪曲北京平暴事件的真相，搞乱人们的思想。从6月4日凌晨起，各种传单、小字报充斥街头，特别是通过港报复印件传播所谓“北京镇压真相”。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复印设备，竟被一些人用来大量复印歪曲北京平暴真相的香港报纸，并四处散发。《世界经济导报》在社科院门前的阅报栏也连篇累牍地张贴港台及西方一些新闻机构编造的“血洗天安门”、“军队内部火拼”、“38军倒戈”等谣言的报刊及图片的复印件。在极少数人策动下，上海高校学生组织了所谓的宣传队走上街头，用自制广播台和手提喇叭传送各种谣言。复旦大学“自治会”还组织一批学生到市政府和一些新闻单位门口用高音喇叭放哀乐。

上海动乱的极少数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在绝望中加紧了破坏活动，策动堵塞大小交通要道，造成事实上的停工、停市，搞瘫经济，搞乱上海。6月4日下午和晚上，上海“高自联”两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6月5日凌晨4时统一行动，驱使成批学生和一些社会渣滓配合下，上街拦截车辆，设置路障。据不完全统计，在6月4日至8日的5天内，全市共有23个马路道口被反复堵塞，有6000辆机动车被强行拦停用作路障，其中有16辆被掀翻、砸毁、烧坏，

有 1223 辆（内公交车 1017 辆）被戳破轮胎或砸坏。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市内许多铁路道口卧轨，拦截火车，破坏铁路运输。光新路等 11 个铁路道口被反复占据、堵塞，沪宁、沪杭线铁路运输中断近 50 个小时，共有 281 列客货列车无法到发。6 月 6 日晚，在铁路光新路道口还发生了焚烧列车、殴打司机和公安干警的严重骚乱事件。在这次骚乱中，共烧毁了 9 节列车车厢，殴打 170 多民警和铁路职工，直接经济损失达 570 万元，骇人听闻，影响极坏。

极少数人策划的堵塞全市交通的卑劣行径激起全市人民的强烈不满。这些人原先的如意算盘是，经过 3 天的强制性的停工、停市，加上他们的反动宣传，就可以引发上海工人自觉的罢工、罢市，谁知结果适得其反。上海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在北京平暴真相的教育和感召下，日益坚定地站到了党和政府的一边，对动乱制造者的怨愤越来越强烈。极少数动乱策划者担心再这样搞下去“会激起民愤”，经开会研究，决定改变策略，组织多路小分队冲击工厂，迫使工人罢工。因为他们认为“工人 1 天罢工的压力，等于学生 10 天静坐的压力”。6 月 7 日起，成批学生小分队便来到了江南造船厂、上钢五厂、大中华橡胶厂、宝钢等一批大厂以及上海柴油机厂等“文革”中的“重灾区”，煽动工人罢工，遭到这些工厂党政组织和广大工人的坚决抵制。

这段时间里，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还铤而走险，大搞恐怖活动。他们煽动大学生“制造、购买武器”，同党和政府进行“武装斗争”。6 月 5 日至 6 日，复旦大学、上海科大、华东化工学院分别贴出鼓动恐怖活动的大字报，煽动学生“抛去一切幻想，拿起各种武器同伪政府战斗到底”；“自制各种化学、机械武器，自发组织各种行动小

组，破坏官僚豪华汽车，打伤甚至杀掉伪军、伪警各级高级官员，破坏军方设施”；还扬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前进，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前进”。复旦、同济、交大、华东师大、外贸学院的一些人甚至公然煽动学生自制燃烧瓶、手榴弹，搞化学武器，爆炸加油站、化工厂，企图制造大乱。在他们的挑唆下，同济一些学生购置了一批水果刀和西瓜刀。一些学生头脑发热，干出了一系列打、砸、抢、烧活动：6月5日，工大部分学生将公交六场1辆抢修车拦住，砸碎玻璃，砸坏发动机，抢走工具，最后将车身掀翻。6月7日，在江湾五角场，一些学生和社会不法分子将1辆公交75路公共汽车放火燃烧。

6月8日晚，朱熔基市长发表电视讲话，号召全市人民动员起来，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市民对市长讲话反应很热烈，认为讲得很实在，讲出了市民心里的话，所提扭转局面措施也非常有力。

朱市长说：“最近几天，我们大家都亲身体会到，上海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我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第一，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第二，因为，我们相信99.9%的上海市民是能够在‘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的口号下团结起来，站在党和政府的一边；第三，上海是中国工业最集中的城市，我们有着最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有508万职工，其中230万是产业工人，只要他们组织起来，支持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公安干警就完全有力量来维护上海的法制和治安。”

朱市长宣布已组织起几万名工人纠察队上街清除路障，

帮助恢复交通，维护正常秩序。

他最后诚恳地说：“市民们，我是你们合法选举出来的市长，是经过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一年多来，我感谢你们信任我，支持我。我一定尽我所能，按照绝大多数市民的意愿来进行工作。虽然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我确实是决心把自己奉献给振兴上海、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在这个危难的时刻，为了稳定上海，稳定大局，维护人民，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

朱市长的电视讲话感动了绝大多数的市民。当天晚上，10万名工人纠察队和干部、市民一起走上街头，一举将200多道口四、五千辆作为路障的车辆推开。凌晨4时40分，全市路障全部清除。市区155条公共汽车和电车路线在凌晨5时全部开通。工人纠察队雄纠纠地站在各路口协助公安干警维持好交通秩序。上海重新恢复和平景象。行人拍手叫好，伸出大拇指说：“还是工人阶级有力量！”

上海动乱之所以能依靠工人阶级一举得到平息，其决定因素是北京动用戒严部队平息了反革命暴乱，从根本上铲除了全国动乱的策源地，也给上海极少数制造动乱分子以极大威胁。上海动乱的最大特点是“南北呼应”。当北面的“老窝”端掉之后，南面的跳梁小丑们也就成为丧家之犬，不堪一击了。

本文根据下列诸文改编：

* 上海动乱真相

施岩

《文汇报》1989.9.21

*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

忻华实

《文汇报》1989.8.19

* 《导报》导向何方？

冯兆

《文汇报》1989.12.2

* 看，社会渣滓在上海动乱中的丑恶表演

甄肖逸 任华文 《解放日报》1989.8.23

五 风波平息后的思考

从4月15日天安门广场出现第一个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到6月4日占领天安门广场的人群被清除出去为止，历时50余天的北京风波终于平息。从此，北京和全国的形势日趋稳定。

痛定思痛，人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对这场风波进行思考，从中得出应有的教训。

为什么那么多人卷入动乱

大家议论得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卷进了动乱？

在这场风波中，全国有84个大、中城市发生了示威游行，除学生外，知识界卷进的人数也相当多。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动乱是妄图颠覆人民政府、坚持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极少数人所策划、组织和煽动起来的。问题是，极少数人为什么能将一大批青年学生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煽动起来呢？

客观地看，新中国建立40年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近十年的改革开放也是走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前列的；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发生了这么大规模，而且时间延续这

么长的动乱呢？

从动乱发展全过程看，策划者的政治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难道卷进动乱的那么多人果真都是想推翻共产党、打倒现政府的吗？当然，在暴乱中，有一批社会渣滓趁机搞打、砸、抢、烧、杀的暴行，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刻骨仇恨。绝大多数学生、市民、知识分子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

少数人能够挑起动乱，的确存在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的原因，客观上有国内外社会背景，主观上也有党和政府的失误，情况是复杂的。

人民对腐败现象不满

我先从几乎人人都痛恨的腐败现象说起。

5月18日，中央领导同志到医院看望在医院接受护理的绝食学生时，有一位绝食学生情绪激动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中国有几大问题：一是人口太多；二是资源相对来说并不富裕；三是文化程度低；四是经济发展起步低。所以中国的事难办，谁上台都不好办。现实状况是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能够取代共产党。人们现在对共产党丧失信心，这是因为共产党在工作上有严重失误，出现腐败、官倒和高干子女经商等问题。我们希望共产党振作起来，领导我们把国家建设好！要使大家恢复对共产党的信心，要从党中央做起，狠狠惩治腐败、官倒，自己子女如果有问题，要下决心从自己子女身上开刀。……他还问，你们同意吗？乔石……等领导同志点头表示同意并和他握手，说：“你说得很好！”

这段录象在电视上播放后，我听到许多人认为这位学生讲得好。一位在大学教书的青年教师说，据他了解，这位同学说的一番话代表多数学生的思想。

许多声援学生的人抱着一种心态：“平时大家对腐败官倒提不少意见不管用，学生们起来闹一下对政府促一促也好！”

动乱的策划者提出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的确是相当成功的，尽管这个口号仅仅是陪衬却起到了很大的鼓动效应，很多人卷进动乱，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有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很说明问题。

早在今年三、四月动乱发生之前，在一次时事讨论会上，我慷慨激昂地抨击了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也批评了政府的反腐败措施不力……等等。在旧社会，我们是反对国民党政政府贪污腐败才参加革命的，对人民政府现在反腐败不力当然不能容忍，言辞不免偏激，引起在座各位注意，这也是正常现象。

但是，不久，动乱发生。我意识到学生背后有坏人操纵指挥，在另一次讨论会上劝大家头脑要复杂一些，对学生的过激行动也有所指责。事后听说，不少人对我有看法：“此人变得真快！前不久还振臂高呼反对腐败，不几天又批评起学潮来了！不可思议”云云。

我听到这种评论也觉得不可思议，难道对腐败有意见的人都要同情学潮？难道反对学潮的人对腐败现象都要采取容忍的态度？后来我才弄清楚，这些对我有看法的人之所以同情学生，其原因就是认为学生参加学潮的动机是出于反腐败、反官倒，别无其他。他们的确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讲

话，说了一段很中肯的话：“这场风波中，极少数人所以能蒙蔽、煽动不少群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内确实存在腐败现象，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我们必须总结这个经验教训，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新华社1989年8月22日电）

近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绩；与此同时，出现了腐败、官倒、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以及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这些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问题的产生，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党和政府作过许多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上成绩不大。为什么成效不大？这与原总书记赵紫阳的指导思想不无关系。他认为在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下，腐败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他为高干子女从事倒卖行为进行辩解，说他们也是公民，在经商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歧视他们……等等。当时，我就很反感。不错，高干子女是公民，但他们与一般公民就是不同。他们从商就比一般公民有更多有利条件。赵紫阳的错误思想言论妨碍了党和政府对腐败现象采取有力的措施。

风波过去之后，党和政府认真接受教训，尽管反腐败的口号对策划动乱者来说是个陪衬，但党和政府却认真对待，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强烈要求，也是党和政府一直在设法努力解决的问题。

7月27日至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一项近期要做的七件事的决定：一、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三、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四、中央领导人一律使用国产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五、严格禁止请客送礼；六、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七、严格认真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

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人民日报》1989年7月29日)

这个决定受到普遍的欢迎。第一，近年来人们在廉政建设方面议论最多、意见最大的几个问题，在这个决定中都做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第二，强调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领导人做起。这是广大人民，包括那位在医院里发表宏论的绝食学生在内，所最关心也是最不放心的一些问题。在廉政建设中，中央有决心从自身做起，人们看到了希望。

那么，腐败现象以及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失误是不是造成这次动乱的根本原因呢？

我看，这只能说是造成那么多人被卷进动乱的重要原因，而不是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

共产党就其性质来说本来不应产生腐败，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年来也是廉洁的。近年来出现了腐败现象，人民对此深恶痛绝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共产党内的腐败现象还没有达到不可救药非要被打倒的程度。人民还是希望党和政府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惩治腐败和官倒，重振党风，赢得广大人民的信任。

在事态发展进程中，党和政府一再声称，在反腐败、反官倒方面党和政府与广大爱国学生是一致的，事实证明党和政府的这一态度是真诚的。风波过后，的确在廉政建设上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就是明证。既然双方在这方面并没有根本矛盾，为什么动乱一再升级呢？可见腐败现象还不是动乱的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这场动乱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长期泛滥。

“自由化”一词来自西方。1953—1957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多次讲话中预言：美国的政策是要促进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

中国人反对杜勒斯旨在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自由化”，冠以“资产阶级”叫“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示与无产阶级关于自由的概念相区别。真正的自由，不违背法制的自由，当然不必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其产生和发展由来已久。

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饱受1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之苦的人民，希望政治上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以利于正常地进行建设。但是，从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内，在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断进行干扰。比较突出的有4次，所造成的思想混乱一次比一次升级，所带来的危害也一次比一次严重，直到1988—1989年最后一次酿成全国性的动乱。

第一次是1979年初，一些人趁党和政府彻底否定10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机，掀起了一股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否定社会主义及共产党领导的歪风。他们打着“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的旗帜，煽动游行示威，冲击中南海，成立非法组织，出版非法刊物。北京西单有一面墙成为他们张贴反动大字报、小字报和标语

的集中场所。所谓“西单民主墙”是发表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论坛。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主席，鼓吹“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一些人也发生了思想混乱，提出了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于1979年3月3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说：“大家知道，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允许的。”

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提出警告：“最近一些与非法组织有关的人物特别活跃，他们假借种种名义，放肆地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种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足够警惕！”

第二次是1983年前后，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出现了精神污染现象。本来理论工作者和文学家、艺术家，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当用自己的作品、教学、演讲，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为人民服务，为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身。但是，一些人却同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污染人们的灵魂。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

少数理论工作者不同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许多重大问题所作出的结论，散布社会主义

在各个领域都在“异化”，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理论根据。他们还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抽象的人性、抽象的民主，离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空谈“人的价值”，呼唤实现自我价值，提倡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瓦解青年人为民族、为人民、为国家奉献的精神。文艺界也出现了不少不健康的和少量的反动作品。

对此，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次会议（1983年10月12日）上严肃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由于当时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此领导不力，清除精神污染工作半途而废。1984年12月，准备召开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时，胡耀邦对筹备小组的人说，在这次会上不要提反对精神污染，不要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自由化思潮正在文学界泛滥之时，这“两个不提”的实际效果，就是对文学界搞自由化的人的支持和鼓励。这就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以及理论界进一步泛滥。

第三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是在1986年前后。这时，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身为共产党员，却发表文章和演讲，放肆地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方励之在同济大学发表演讲，公开宣布：“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的结果是失败的。”他主张“全盘西化”。有人提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超越了历史条件，应“补资本主义的课”。有人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说，改革就是要改变“一党领导”。一时间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言论纷纷从各报刊上冒出来。

在这种气氛下，由方励之所在的中国科技大学带头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学潮，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

道路的口号。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学潮，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出党，胡耀邦也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辞去总书记的职务。

邓小平针对这次学潮，尖锐地提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他说：“这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

吸取以前的教训，本应该按照邓小平的指示，认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新上任的总书记赵紫阳对此消极应付，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来限制甚至取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于1987年5月13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失去了公开的市场，”“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从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就草草收兵了。在这以后，那些因宣扬自由化而受到批评的人纷纷重新登场，象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又是写文章，又是演讲，又是被请到海外讲学，红得发紫。他们以加倍的疯狂宣扬自由化的理论和观点。赵紫阳还保护、网罗一些坚持自由化的人作为自己的智囊团。他们控制了“三所一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同时，他们又进一步控制了一些舆论阵地，特别是“两报一刊”（《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新观察》半月刊），使出浑身解数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理论、观点，影响十分恶劣。而对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自由化的人，赵紫阳则采取很不正派的手段加以排斥、压制和打击。因此，1988

—1989年第四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便以更加疯狂的声势泛滥开来。

第四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是一股恶浪，席卷政治、经济、文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哲学观点、政治观点、文艺观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纷纷出笼。这些理论和观点与直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思潮是有区别的。譬如：“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一切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不能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划等号。但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是同社会主义思想根本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想一旦泛滥，就必然成为瓦解和动摇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必然导致人们迷恋资本主义。

这段时期，发生了一次所谓“蛇口风波”和一阵《河殍》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谓“蛇口风波”，其实是几家报刊有意制造出来的。1988年1月13日，有几位知名的青年教育专家到深圳参观访问，在蛇口参加了当地青年人的一次座谈会，双方在发言中有几处意见相左，这本来是正常现象，有不同意见可以相互交流甚至辩论都是很平常的事。然而，当地一家报纸在1988年2月11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的消息，3月和4月又连续刊出两篇文章：《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的交锋》、《“神的文化”是对人的全而窒息》。这些报道在全国引起了反响，有几家报刊也跟着蛇口这家报纸的调子向青年教育专家发起进攻，认为他们是教师爷式的人物，以陈腐的说教向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灌输，这在改革开放时代必然行不通而受到反抗……云云。

1988年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蛇口风波”问答录》,这是一篇貌似客观公正,实际上明显地倾向另一边的报道。有人把它称为一颗“重型炸弹”,它抛出来后立即将这场风波推向一个新的高潮,除全国数百家报纸就此发表文章外,理论界、文化界、新闻界一些著名人士,也纷纷参加讨论,基本倾向是一边倒。

所谓“陈腐的说教”与“现代意识”交锋是什么呢?

我仔细阅读过大量的评论,得出一个看法,简而言之:他们把“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奉献精神批判为陈腐的说教,而把“一切为了赚钱”、“什么理想、信念、为祖国做贡献,没有那么回事”吹捧为现代意识。当时我就很气愤,在社会主义中国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真是怪事。甚至《人民日报》也卷了进去,让人难以理解。

当然,资产阶级人生观和价值观与直接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能划等号。但两者显然是有联系的。满脑子拜金主义的人,不会真心实意地相信社会主义。

这期间,《河殇》6集电视片的出笼在海内外引起意外的轰动效应。

《河殇》是1988年6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上播放的。它不是风光纪录片,而是借黄河说历史,对中国文化进行评论,形式比较新颖,有些人就是在这一点上被吸引了。

我在电视上看了两集,对于制作者百般嘲笑挖苦自己祖宗的内容实在看不下去,就不看了。但是在一片叫好声中,我不能不找来《河殇》解说词,利用坐火车去昆明的3天时间,强迫自己认真地一遍一遍地仔细阅读。我要求自己尽量客观,有好就说好,有坏就说坏,决不意气用事。后来,我

又阅读了观众和文化界人士的大量评论，最后自己得出一个看法：尽管《河殇》在电视制作上有所创新，但它宣扬的基本思想，我是不能赞成的。

我最不能同意的是《河殇》彻底否定中华文明的观点。作者反复地谴责黄河孕育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

“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从黄河里流淌出来。”

“这片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科学精神。”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照作者看来，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明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中国不象美国那样夹在两个大洋之间，而是一块封闭的大陆，这决定了中华文明是封闭性的，是落后、保守的。

我也不能同意《河殇》对西方文明毫无分析的赞美和歌颂。《河殇》用象征手法，把中华大陆文明称之为“黄色文明”，而把西方文明，或资本主义文明称之为“蔚蓝色海洋文明”。“黄色文明”被贬得一钱不值，而“蔚蓝色海洋文明”则被吹捧得有神奇的力量。

《河殇》说：“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代科技某些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作者在这里用一种曲笔，明白无误地表明他的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一个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来推动科学和民主的胜利。”《河殇》还借

普列汉诺夫之口，证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夺取政权“过早”了，“超越”了资本主义“必要的发展阶段”，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那么，唯一出路就是回过头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了。

如果说《河殇》用艺术手法拐弯摸角地表达一种中国的改革开放要“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那么，1988年以来，知识界一些人物写文章、发表演讲，就明明白白地提出他们要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了。

1988年12月7日，金观涛在一次讨论会上公开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的主编戈扬则更加油添醋地说：“搞社会主义是唯心的，本质上是封建主义，它的头子就是封建皇帝。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这些言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否定十分露骨。

1989年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 告全民书》的大字报，公然说：“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

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

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国情”的问题。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还在经济问题上鼓吹私有化，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方励之于1988年6月14日在《香港时报》发表的言论中说：中国改革“唯有变革所有制为‘私有制’方是根本方法。”

早从1988年5月起，宣传私有化十分卖力的《世界经济导报》在1989年2月6日又发表文章说：从私有制的观点看，“改革中的问题比人们想象的简单得多，解决的办法也比人们想象的容易得多，这就是彻底实行私有、民营。”

除了舆论宣传以外，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出现了一系列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和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学生和青年教师以谈论所谓“新思潮”为荣，满口新名词，夸夸其谈，对党和政府则恣意评头论足，对现实社会问题并无多少调查研究。

在这种火药味很浓的气氛下，在大学工作的人都感觉到要出事。这次动乱中的活跃人物，《河殇》的主要撰稿人苏晓康在一篇4月5日撰写的文稿中意味深长地写道：

“1989年——一个仿佛决定要同许多历史巨灵会晤的奇异的纪念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第二国际成立1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第三国际70周年、建国40周年、庐山会议30年祭、‘九大’20周年、刘少奇死难20年祭，等等。这一年里，真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横竖谁也别想躲得开那一个个迎面扑来的，不管让你高兴还是叫你发愁的日子。……你想‘睁只眼闭只眼’，他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文汇月刊》1989年第5期）

他这番拐弯摸角的话说白了就是：“我们要找一个纪念日闹事，你想躲也躲不开！”

动乱的策划者原先选中了5月4日的“五四”运动70周年发难的，4月15日胡耀邦猝然逝世给他们提供了再好不过的良机，于是提前发难了，借悼念胡耀邦提出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顺理成章。

自由化代表人物

动乱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前文已经说过。另外，从全过程看动乱的幕后策划者绝大多数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

方励之和他的妻子李淑娴是被外国人封为“持不同政见”的人物，他们直接指挥学生“领袖”。4月27日将游行示威的主调改为“反腐败、反官倒”就是他们出的主意。

动乱的另一个主要策划者严家其，早在1979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兴起时就是活跃人物。他原来学物理，后改行从事哲学研究。1980年又“研究”政治学。他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三本书：《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首脑论》、《思想自传》。他的基本政治观点就是主张中国应学习西方，实行“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保卫马克思主义就是保卫“中国封建文化”。他被海内外一些人捧为“新型政治家”、“政治精英”、“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权威”、“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他在5月份从幕后跳出来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发表声明，为学生“领袖”们出谋划策。6月4日后逃往海外，与吾尔开希、万润南等人组织反政府的“民主中国阵线”，受到美国、法国、台湾、香港反动势力的青睐。

作为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总书记的万润南，在动乱中的表演也是十分猖獗的。他原是四通集团公司的总裁。他的一位亲信曾说：“现在外界盛传我们‘四通’是学运的后勤部、参谋部和指挥部。这些评价万润南是当之无愧的。”“四通”公司本来是以高科技开发为己任的，万润南也借此获得了企业家的荣誉。然而，他办“四通”并非着眼于科技和经济，他宣称要搞政治。他的主张就是在中国呼唤私有制，而要解决所有制问题，用他的话说“这已经超出经济改革的领域，变成一个政治改革问题”。他心目中政治改革目标就是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实行“议会民主”。

此外，那些在动乱中或为学生“领袖”出谋划策或跳到前台亲自表演的人物，如刘晓波、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研究员）、金观涛……等等，无一不是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

那些在动乱中冲锋陷阵的所谓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柴玲之流则对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佩服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他们满脑子都是这些“老师”们传授的“真经”，动辄是“方老师怎么说”、“李老师怎么提醒。”从1988年5月4日到1989年5月12日，王丹在方励之、李淑娴直接“指导”下，主持召开了17次“民主沙龙”，邀请包遵信、戴晴（《光明日报》记者）、吴祖光（作家）等人物演讲，向大学生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受自由化思潮影响的群众

我还认为，动乱中卷进去的许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有不少程度不同地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毒害。如果说他们主观上已经具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明确的目的，那是冤枉了他们；如果说他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冲击下，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某种程度的动摇，则是符合实际的。

我认识的大学生、青年教师和中、老年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卷进了动乱。我常常想他们为什么认不清形势呢？他们的确反对腐败，但是缺乏阶级斗争观念，看不到国内外反动势力插手；此外，在近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冲击下，他们部分地接受了一些错误观点，因而，对天安门广场上散布的某些口号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鸣。

举例来说，我和一位朋友议论到绝食学生总是不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事时说：“动乱再闹下去，必将推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他显然不同意我的看法，站起来挥着手势说：“历史将证明学生的爱国行动推进了中国的民主进程！”我们话不投机也就没有再议论下去。第二天，他参加了声援学生的游行。

对他的言论和行动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一向标榜“思想解放”，“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实际上是对社会上流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些观点听得顺耳，容易接受。譬如，赵紫阳欣赏的电视系列片《河殇》被吹捧得神乎其神时，他也跟着唱赞歌。蛇口风波一出现他就表示支持。……但是，我

了解他并不反对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他认为共产党太保守了，应更加开明一些；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太成功，应更多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点。有这种想法的人容易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俘虏。

大学生卷进学潮和动乱的，有不少也是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但是，他们与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在本质上是区别的。有一位了解大学生思想情况的作者，作了如下深刻的分析：

“在广大同学身上，爱国的愿望与政治上的天真幼稚同在，爱国的情与情绪上偏激并存。这些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宣扬资本主义、贬低社会主义的论调不绝于耳，由此形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思想和舆论氛围。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如抽象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观念，从各种渠道侵蚀着青年学生的灵魂，使他们程度不同地受到毒害。这几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放松了，再加上改革开放在取得了显著成就的同时，也有一些失误，由此加剧的一些社会问题，如经济过热，物价上涨过猛，通货膨胀明显，社会分配不公，官倒和腐败现象等等，在社会上形成种种不满情绪，也影响着青年学生。因而，有一部分学生对党不信任，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发生动摇，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悲观失望。总想从社会主义之外，去寻找某种医治社会积弊的灵丹妙药。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不少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一套论调，听起来顺耳，说起来顺口，而不加深究。有少数人天真地认为，不管什么“主义”，不管什么“所有制”，只要能加快国家经济的发展，能较快改变国家

的贫穷、后进的面貌，就值得一试。他们政治上的这种不成熟性，使他们容易上当受骗，而不知不觉地和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学潮。加之，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和散播了种种政治谣言，使得很多学生被牵着鼻子走，有极少数人干出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还自以为是所谓‘爱国’的行为。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李征：《善良的爱国愿望为什么会走向反面》《人民日报》1989年7月28日）

谈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恶果，还不能不提到这股思潮对新闻界的恶劣影响。《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在这场政治风波中的错误舆论导向，使相当一部分群众误以为党中央支持学潮从而卷入动乱。这些报刊这样做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长期在新闻界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的结果。实际上，世界上哪有纯粹的新闻自由？作为美国政府喉舌的“美国之音”有煽动中国动乱的自由，它有反对动乱的自由吗？

由此推论，《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当然没有支持动乱的自由。

党从风波中吸取血的教训

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党和政府本身工作的失误。

如果不从共产党本身的失误中寻找内在的原因，如果不痛下决心重整党风，有朝一日，外部气候适宜的话，动乱还会重起。抱着这种想法，我读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就

党的建设问题所作的重要讲话（新华社 1989 年 8 月 22 日电），感到宽心了。从这一讲话中，我体会到共产党真正从这次风波中反省到党的建设本身问题，并且痛下决心加以整顿。

宋平首先提到平息暴乱说明党是“有战斗力的，是任何敌对势力搞不垮的”。在这个大前提下，他尖锐地指出：“从动乱的酝酿、发生、升级，直到最终酿成一场反革命暴乱，问题主要出在党内。”这句话份量很重，内涵也很丰富，值得我们深思。他指出：“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平下一句话也耐人深思：“这次动乱和暴乱的煽动者、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不少是共产党员。”这就是说共产党内有人与外面的人勾结起来反对共产党。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呀！

原来有不少好心人担心暴乱平息之后，党和政府把动乱根源归结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之后，不认真反腐败，不认真工作以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那么动乱的危险就仍然存在。读了宋平讲话后，朋友们表示放心，真正痛下决心从整顿共产党本身做起，安定的局势有望，国外施加压力也不可怕。

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等党内领导职务、组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当然是最重要的整顿。那么赵紫阳究竟犯了哪些错误？

赵紫阳的主要错误

他的最主要的错误是在言论和行动上支持了动乱。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应该领导全党平息动乱，而他却违背全党的意志公然支持动乱，这个错误可真是非同小可。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1989年6月30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长篇报告中列举了赵紫阳在事件发生各个阶段支持动乱的具体错误。这里举其要者：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学潮已发展成动乱，北京市委一再要求中央讨论对策，以便制止事态的发展，但赵紫阳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中央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

——他在朝鲜时同意《人民日报》4.26社论对事件定性为动乱，回国后5月1日仍然同意，过了两天突然指责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在受到抵制后，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与4.26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

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他的这个讲话给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撑了腰，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他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声援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使大量读者误以为党中央支持学生的行动。这也是不少人卷入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赵紫阳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这个谈话公布之后，天安门广场立即出现“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的叫嚣。反邓之风掀起高潮。

——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一名在赵紫阳身边工作的人向非法学生组织头头透露了机密，说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5月19日晚，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派军队入城，赵紫阳拒绝出席，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在电视荧屏上公开暴露于众。

赵紫阳的错误不仅仅是支持动乱，据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的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他被免职，并决定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真抓党的建设，无疑是从动乱中吸取了血的教训，我想只要从上到下贯彻到底，长期坚持下去，国家的长治久安有望。

· 国际上的大气候

邓小平对北京风波起因说了一句概括而深刻的话：“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1989年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谈话）

北京风波的“国际大气候”是什么呢？我想就是指国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全球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出现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及西方一些国家在使用武装干涉和颠覆的办法对付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得手时，改变策略，采用和平演变的办法。他们把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自由势力”自己起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他们长期的方针。

50年代初，杜勒斯公开宣称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掌握共产党政权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身上。

近年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搞改革。国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抓住这个机会，千方百计施加影响，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渗透，妄图把改革引向歧途，对中国也不例外。我们的改革是要改革掉各种弊端，更好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他们却企图让我们将社会主义改革掉，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最终成为某个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

为了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美国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

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利用派学者、教授，到中国教学、演讲，宣传美国文明。应该说，学者教授中不乏友好的人士，但作为美国的国策，其目的是实施思想文化渗透。美国一政府机构在1989年5月6日一份材料中沾沾自喜地宣称：“从目前中国形势看，我们派往中国的教授对传播美国文明、宣传美国文化，特别是带到中国去的小册子在北京学生中广泛传阅，对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发挥了作用。”

美国每年邀请百余名中国各界对决策有影响或潜在影响的人士访美，希望在这些入中有朝一日产生身居高位的人。在中国留美学生中培养一批亲美派，也是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目标。

美国还在那些对中国政府决策起一定作用的人身上下功夫。近年来，美国把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机构某些负责人看作重点拉拢对象。这些被称为对中国高层决策有影响

的“青年官员”，果然在这次风波中起了上窜下跳、煽风点火的极恶劣的作用。

美国还竭力扶植亲美势力，培养他们的代理人如方励之。布什当上总统首次访华，就制造了邀请“持不同政见”的方励之出席告别宴会的事件。此事虽未成，也表明了美国政府公开支持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的顽固立场。方励之搞动乱十分卖力，失败之后又得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庇护。除方励之外，美国还网罗在中国历次学潮和动乱中闹事的人物在海外组织反动组织，妄图有朝一日返回大陆，进行反政府活动。

“美国之音”在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它的中文节目，在平时起了宣扬西方文化和美国生活方式，对我国进行“心理战”的作用；而在这次动乱和暴乱中则使尽了浑身解数，煽动甚至指挥不明真相的人，起来闹事反对中国政府。4月20日晚上，“美国之音”就广播说中国学生计划4月22日到天安门广场绝食，这等于在下通知。5月15日中苏会谈，在这之前，“美国之音”就连续广播说，分析家认为，选择5月15日到天安门示威，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因为这个时候全世界有一大批外国记者在天安门广场采访。“美国之音”丢掉客观报道的伪装，用“分析家”的名义直接指挥中国学生了。在每天12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中，“美国之音”传播了大量的谣言。例如：

5月15日 首钢有7万工人罢工。

6月22日 刘宾雁称，中国有100多高级将领反对戒严。

6月4日 军队已开进北京高等院校，强行接管。

6月6日 邓小平已去世，李鹏被刺伤，刺杀他的年轻

军官自杀。

28军、38军与27军在军事博物馆附近发生冲突。……

“美国之音”制造了大量的谣言，在一定时间内起了蛊惑人心的破坏作用，但是最终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同时也暴露它决非“客观”、“公正”的真实面貌。

北京风波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决不能低估国际上的反动势力推进“和平演变”战略的危害作用。今后，我们无疑还要推行改革开放，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我们无疑还要和各国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我们无疑还要发展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但对国际反动政治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却不能丧失警惕。

六 中国能不能长治久安？

——40年的回顾与展望

震撼全中国的政治动乱发生在新中国建国40周年，我特别感到痛心。

40年前，新中国宣告诞生的那一天，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天安门广场上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余兴未尽，相约一同到东交民巷去“游行”。我们5人手挽手，脚踏正步前进。边走边发自内心地呼喊口号：“解放万岁！”、“人民中国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还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兴奋得热泪盈眶。

那一天是狂欢的日子，路人看见几个发狂的青年也不奇怪，有的还为我们鼓掌。

我们5人都是20岁刚出头的热血青年，解放前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受迫害，先后逃亡香港。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后，我们回到祖国，有幸参加了划时代的开国大典，全身热血沸腾，非要宣泄一下不可。东交民巷原是外国领事馆区，我们就是要在新中国诞生这一天，到曾是帝国主义分子耀武扬威的地方大摇大摆游行示威。我们的心中升起崇高的民族自豪感。中国人民解放了，再也不受外国人欺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每回味起这次“自发游行”，我都会心地一笑，唯独在

1989年春夏之交，想起这段情景时，一阵阵隐痛不由得袭上心头。

记得，去年5月17日，在本单位一次集会上，我诚恳地奉劝同事们不要到天安门去声援绝食的学生；之后，我骑自行车回家，却遇见一队队迎面而来的群众，或乘卡车，或踏自行车，打着旗号和标语呼啸而过，前往天安门声援绝食学生去了。路旁市民为他们鼓掌。有一位我认识的老诗人竟然也带着一家老小在路边拍手助兴。看到这种情景，我内心活动非常复杂，愤懑中夹杂着痛苦，悲哀中交织着困惑。

被敌对分子煽动起来的一些群众公然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我理所当然表示愤懑。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的共产党竟然遭到部分群众反对，我感到困惑。40年了，怎么竟然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一时说不清，也想不透。

在那动荡的56天之后，我对于北京风波发生的原因和教训曾作了初步的反思。时隔半年，尤其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急剧变化之后，我感到有必要对新中国建国4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10年的成就和失误，得与失作一番冷静的思考，否则就不能有说服力地回答摆在中国人民和关心中国的外国朋友面前的一个大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究竟还灵不灵？与此有关的是拥有11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能否长治久安？

两种不同的态度

新中国建立40年来，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是成绩大还是缺点大？从总体看是成功还是失败？这本来是不成

为问题的。但是近年来，在人们心目中，尤其是在20岁上下青年人当中，这些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却成为了大问题。为什么呢？原因很复杂，思想被搅乱了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理论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精英”们利用舆论工具，大肆宣传党和政府建国以来的失误，如肃反、反右的扩大化，大跃进的荒唐做法，“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斗争和混乱状况。许多年轻人看了揭露和批判这些错误的报告文学、小说和电影，脑子里印下的新中国的形象，是扭曲了的。事实上，新中国果真是一团漆黑而没有光明吗？

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知识分子，对反右斗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问题，并不是没有沉痛的感受；但是，我们对于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对于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更是倍受感动，并深受教育。记得在1959—1961年的困难时期，外有国际压力，内有天灾人祸，人民生活困难到几乎人人都吃不饱的地步。然而，那时期，中国大地上没有乱，很少听到埋怨和牢骚，人们默默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艰苦奋斗。大家都知道领袖毛主席也与警卫约法三章：一不吃肉；二不吃蛋；三吃粮不超定量。那时，共产党和毛主席享有崇高的威信，党和人民密切结合起来产生的力量真是强大无比。80年代的青年对此知之甚少。

从50年代到70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打击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知识分子，造成的后果是让人痛心的，从中的确应吸取深刻的教训。1979年以后，党中央陆续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而且决定以后再也不搞政治运动。既然如此，从个人来说，有什么理由再和党算旧帐，扭住不放呢！

笔者在此坦率地向读者表白，我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

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为此，我被开除出党，而且家庭，尤其是两个儿子的前途都受到影响。作为在学生时代追随共产党革命的热血青年，结果被共产党错误地当作敌对分子，我内心的痛苦，就象儿子被亲生父母误解而被抛弃一样。20余年来，我没有想到居然有一天可以得到平反，但我始终没有灰心，抱着一个信念，就是为人民服务。我对自己说，你为什么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中国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吗！现在，虽然不在共产党内，还是要抱着共产党人的信念为这一目标而奋斗。一个人的信念不能随个人遭遇而转变。因此，不管分配什么工作，我都拼命干。有一次，居然挑40公斤煤走了15公里路，中途还爬过一座小山。同事和上级也看出我的心思，想尽办法分配环境允许我做的工作。不被信任的20年并没有白过，在平凡的岗位上我得到了扎扎实实的锻炼。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平反了，重新恢复了党籍，还被委以重任。我毫无怨言，仍然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埋头工作，觉得生活得很充实，很有意义，受委曲的往事很少去想。当然，有人受到的打击比我严重得多，有点委曲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有几位好朋友也在50年代在政治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得不到党的信任。他们在1979年以后与我一样，恢复了名誉，当了大学校长、中央级报刊总编辑、外事部门的顾问、中央部门的局长……等等。我们碰到一起从来不为个人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抱怨，而是一切向前看，更多的是从忧国忧民角度议论各种问题。有些年轻人耻笑我们这一批中老年知识分子“愚忠”。

坦率地说，“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威望太高了，我们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错误看不到或者看到

了不敢往深里想，也不敢说，确有一定程度的“愚忠”。但是，1979年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在改革开放的10年中，党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还提倡“思想解放”。我们这些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人近年来还多次到国外访问考察，走遍北美、西欧和东亚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也算开阔了眼界吧！我们对自己国家落后之处、党在建国40年来失误之处，甚至我们民族的弱点，现在不是看不到，而是看得比较清楚了。我们是爱国的，时时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决不会站到卖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辱骂自己的祖国，但是我们并不护短，也不妄自菲薄。

我们要求自己实事求是地估计建国40年的成绩和缺点，而对待我们国家的落后、党的失误以及民族的弱点，我们的态度是一不悲观失望；二不轻率地相信别国适用的“药方”；三根据中国国情和经验教训，并参考外国经验，寻找自己的出路。抱着这种态度的爱国知识分子能说是“愚忠”吗！

我生于1925年，幼年时经历过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我在沦陷区遭受过亡国奴的痛苦，抗战胜利以后，看见过旧中国上层社会纸醉金迷、糜烂腐败的生活，也体会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劳动人民受压迫、知识分子没有出路的市民生活。有这样历史背景的我，对新中国的40年的体会当然与一般年轻人有所不同。

40年的成绩和失误

40年来，新中国作为独立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屹

立在东方，战胜了外国侵略势力一次次对我国进行的孤立、封锁、干涉、破坏和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中华民族的尊严。每想及此，我都为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感到无比自豪。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包括海外爱国华侨，从来没有象这40年那样，挺直腰杆，扬眉吐气。

40年来，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经济面貌根本改观，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2万多亿元，40年来增加的固定资产，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资产的126倍。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14000多亿元，相当建国初期的12倍，居世界第8位，工业总产值居于世界第5位，农业总产值居于世界首位。一些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占世界的位次迅速提高。钢从1949年的世界第26位提高到1988年的世界第4位；发电量从第25位提高到第4位；原油产量从第27位提高到第5位；另外，煤、水泥、布、丝绸、谷物、棉花、肉类的产量都已跃居世界首位。

农业生产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88年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两倍半，在人口不断膨胀的情况下，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占世界14分之1的土地上解决了世界5分之1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世界公认的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传统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微电子工业、航天工业、核工业等一大批新兴高技术工业也发展起来了。

中国独立自主地制造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通讯卫星和洲际导弹。没有比这件事更能说明中国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的了。它不仅说明中国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先进的科

学技术，而且显示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它说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智慧、有力量自力更生地攀登世界先进技术高峰。

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显著的提高。1988年全国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建国初期提高了3倍。绝大多数人，在吃、穿、用、住四方面都得到改善。人民的平均寿命已从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69岁。

作为旧中国的过来人，我对新中国上述成就，与旧中国相比较，也许带有格外兴奋的感情。无论如何，这些都是铁的事实，只要不是带着仇视新中国黑色眼镜的人，都无法否认。应该说，中国并不是一片漆黑。中国有光明，有希望。

当然，我们40年来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建国以来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左”的错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深刻的反省和分析。

决议指出，在1956—1965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不但没有推进社会进步，反而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转折点。这次全会，全面地、认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开始了建国以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

改革开放的10年（1979—1989），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旺盛，国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的新时期。10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6%，超过1953—1978年每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也大大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年平均增长2%—4%的速度。1988年和1978年相比，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10年来，全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累计477亿美元；已批准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已近1.6万家。这10年间，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农民人均收入平均增长11.8%，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增长6.5%。在吃、穿、用、住全面改善的基础上，城乡居民储蓄款额由1978年末的211亿元增加到1988年末的3802亿元。全世界有识之士对中国改革开放10年的明显进步都是承认和赞赏的。

既然改革开放10年成就显著，城乡人民又最受实惠，为什么在1989年春夏之交会发生震惊世界的政治动乱和暴乱呢？笔者在前文作过一般性分析，这里，则从10年改革开放的得与失的角度，进一步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大体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从1979—1984年，改革的重点首先在农村展开，主要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农业出现了全面的和持续的增产，推动了城市的改革。这一段，城市主要是围绕着扩大企业自主权，进行了一些试验性改革。第二段从1984—1988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转入了城市。第三段，1988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的

方针，中国经济进入新的调整 and 改革并举的时期。

经过 10 年改革，中国原有的僵化、封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具有活力的、开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转化。改革与发展相互促进，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

所有制，开始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结构转变。国营企业开始由政府部门的附属物，逐渐向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转变。市场价格从统得过死到逐步放开。目前，大约有一半商品包括作为商品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由市场调节。国家在经济管理上，指令性计划产品和统一分配物资品类大大减少。整个经济向着搞活的方向演变。

市场是活跃经济的一面镜子。许多外国评论家的印象是：中国的市场是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市场中最为繁荣的。中国人自己的感受更加深切。

在穿的方面，10 年前，市场上成衣品种单调，数量也不丰富，北京普通市民向市长提出的要求中就有解决“做衣难”的问题。到服装店去做衣服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要找比较理想的裁缝，甚至还要“走后门”。

现在，服装市场最为兴旺。不仅一般服装店数量增加，还出现不少专门出售新潮服装的时装店。各大中城市都新兴起个体摊贩组成的服装“巴扎”。在那里，高中档服装都有，花色品种琳琅满目。买衣服已不成为问题，而且逛服装市场成为中青年男女一种业余享受。做衣服也不难了，新出现许多集体和个体成衣铺满足了市民不同的要求。

外国人曾讽刺中国是“蓝色蚂蚁的王国”，形容人们一色蓝灰色服装，尤其是冬天，不管男女老少，几乎都是蓝色棉

袄和棉大衣。今年冬天，我特地留意北京街头有多少人穿棉大衣。除偶然看见有老人或上班工人还穿一身棉袄、棉大衣外，大约70%—80%的人都穿色彩淡雅或鲜艳的羽绒服，另外，约10%的穿呢大衣或皮大衣。中国产的羽绒服不仅在国内市场上畅销，也走向了国际市场，尤其在苏联和东欧深受欢迎。

在用的方面，10年前，人们追求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10年以来，人们奔的是录音机、电视机和电冰箱。市场上这三大件有进口货，国产的花色品种也不少。据统计，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每百人拥有录音机是0.2台，1988年发展到8.3台；电视机则从每百人0.3台发展到13.2台，而且在城市，黑白电视机已渐渐为彩色电视机所代替。

在吃的方面，由于农业改革后生产的发展以及流通领域商品的畅通，反映在市场上的变化更为显著。

举一个小例子。笔者喜食花生米。西方人喝酒不用下酒菜，中国人则不同。老百姓喜欢把盐煮花生当下酒菜。但10年前，市场上几乎买不到花生米。80年代初期，有农村妇女提着小篮子在街头出售花生米受到市民欢迎。有一年春节晚会上出现一个河北妇女到北京卖花生米的喜剧小品，轰动一时，常听到有人模仿河北妇女口音喊：“卖花生仁哟！”。如今街上喊卖花生仁妇女不见了，无论国营、合作经营商店和个体摊贩都有花生米出售，一年到头都有。不要小看这件琐事，它同样说明大道理。农业改革后，农民改变了单一种植计划，适应市场需要，发展多种经济作物，而在流通渠道上则改变了国家一手包办的局面，集体和个体一齐上，市场就搞活了。

由于食品市场供应丰富，家庭妇女很少为买菜发牢骚了，不少人已把逛市场作为乐趣，一、想买什么基本上都能买到；二、不用排长队；三、不用看售货员的长面孔。以往，在家里请客吃饭，很伤脑筋，市场上缺这少那，很难安排。如今，你想买什么有什么，只要有钱。这种变化不可能用数字来表现，然而在人们心理上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据统计，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1988 年比 1978 年提高 108%。10 年内 11 亿人口平均消费水平提高 1 倍，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

10 年改革开放的失误

尽管改革开放成绩是明显的，城乡人民也得到了实惠，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毕竟是新事物，没有现成的成熟的方案可以遵循，以致在前进中遇见不少问题和困难不好解决，再加政府在领导上又有失误，逐渐形成三大问题，引起社会的议论和不满。

一是物价上涨过快。中国建国以来一向执行稳定物价的政策。物价长期保持稳定，人民当然满意，但是在经济上却积累下不少问题，譬如农产品价格偏低，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1979 年 3 月，国家提高了粮食、棉花、生猪等 18 种农产品收购价格，幅度在 15%—50% 之间。这样，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价格相应提高。为了不影响人民生活，国家采取补贴的办法，为此，每年国家财政上要花一大笔钱在物价上补贴。实际上，市场上有的商品价格远远低于价值。从 1980 年起，国家对物价进行改革，改变国家对价格管得过多过死

的做法，逐步放开一些商品的价格，让市场进行调节。如：1985年放开了猪肉的价格，1986年放开了自行车、黑白电视机、电冰箱、80支以上纯棉纱织物……等7种工业消费品价格，随后，又放开24个大类749种小商品价格。1987年国家明确规定，采取三种价格形式，即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1988年价格完全由市场调节的产品，在农副产品中估计占65%，在工业消费品中约占55%，在工业生产资料中约占40%。

现在看来物价政策的改革，放开部分商品物价由市场调节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但是，从1984年第4季度以来，由于经济过热，造成通货膨胀，物价连年大幅度上涨，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比1987年上升18.5%。后来，政府果断地采取了治理、整顿的政策，收紧基建投资和信贷资金，控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在1989年逐月下降。

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超越了群众、企业和国家的承受能力，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这些情况，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群众的严重不安，影响了社会安定和群众对改革的信心。

二是收入分配不公。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个人收入的来源从过去的单一的工资收入逐步演化为多种收入并存的局面，即工资收入、资金收入、财产收入、雇工收入和各种补贴、福利。此外，政府对个人收入的调控手段由过去高度集中的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方向转化。如国营企业有权根据自己的经济效益调节工资高低。但是，由于新的调控手段尚不健全，出现两种分配不公现象。

1. 改革前分配上存在的平均主义不仅没有改掉，在某

些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中还有所滋长和扩大，这主要是由于个人收入中，福利奖金与补助的比例增加，有的单位达到50%。这些收入大都是平均发放的。据国家统计局对48个城市的调查，1988年1—4月同1985年同期相比，科研单位的实习研究员与研究员工资差距由1比3缩小为1比2；机关办事员与司、局长由1比3.1缩小到1比1.6。

2. 社会上少数从事“第二职业者”以及雇主、个体户等与广大干部职工收入差距拉大。例如，有的职工从事无证经营或充当“掮客”，承揽业务，收取相当数量的“回扣”和好处费；有的演员在本团体安排演出外，在社会上从事别的演出得到高额报酬，有人一年可得十几万，而没有这种机会的演员单靠工资一年不过一、二千元。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倒挂的现象也较为普遍。涉外的企业收入较高。有一位同事，勤勤恳恳从事翻译工作近30年，获得副译审职称（相当副教授），月工资170元；而她的儿子，初中毕业，学会一点日语口语，到一所中外合资公司做一般工作，工龄不到一年，月工资380元。她的丈夫也是副译审，工资相同。刚参加工作的儿子工资一下子就超过了有近30年工龄的父母工资之和。这种不合理现象并非十分特殊。据上海调查，个体户年收入平均在5000元以上，超过万元的占10%。在小商品市场上，有的个体摊贩年收入达十几万元；而一级教授最高工资收入也不过在5000元左右。

社会各阶层物质利益差别没有达到比较合理的程度，以致使不少社会成员感到有“气”。

三是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领域秩序混乱。“官倒”、“私倒”、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不良现象有所发展。

1988年，全国检察机关在打击经济犯罪中受理贪污、受贿、偷税、抗税案件66300多件，查获赃款、赃物（折款）总计4.23亿元。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报告：当前贪污、受贿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贪污、受贿的金额大。1988年立案侦查的案件中，贪污、受贿10万至50万元的有122件；50万至100万元的22件；100万元以上的15件。二是基层掌管财物实权的人多，有近70%的作案分子是企业、事业单位的厂长、经理、财会、采购等人员。三是发生在银行、建筑、粮食、供销、物资系统的多。四是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案件增多。一些犯罪分子向国外、境外商人索取或接受贿赂；有的作案后携款潜逃。

对于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在《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7日）一文中有所分析。他认为这些现象的滋生和发展，不是由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恰恰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

“拿腐败现象的滋长为例，这绝不是自由化的鼓吹者所宣扬的共产党已经腐败，也不是他们宣扬的腐败是由于实行了公有制和坚持党的领导的结果。事实上，共产党内有腐败现象，但是凡是公正的人都会承认，共产党的总体是好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从理论上说，公有制和共产党的性质同腐败行为是截然对立的，而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才与腐败行为有内在联系。从实践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来，我国早就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在很长时期内却并没有出现腐败行为

滋长和泛滥的现象。而在实行私有制和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腐败现象不仅没有绝迹，相反地带有普遍性，只是一个时期内我国新闻媒介不予揭露而已。

“那么为什么近几年来我国党和政府中的某些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呢？应当说，这同赵紫阳同志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指导思想分不开的。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分配方式，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往，本应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警惕‘糖衣炮弹’。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艰苦朴素的传统几十年也不能丢弃。但近一个时期来，高消费甚嚣尘上，视铺张浪费为大方为光荣，看艰苦奋斗为小气为羞耻，这种是非颠倒正好为腐败现象的滋长提供了土壤。而‘一切向钱看’、‘斤斤计较’、‘两两计较’、‘能挣会花’、‘为个人主义正名’之类的舆论，又为腐败现象提供了理论根据。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而恰恰是背弃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

他还认为分配不公也是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而通货膨胀的产生和发展，更是同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分不开的。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启发性的。

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党和政府也有失误。建国40年来，前30年不断地反“右”，结果犯了“左”的错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0年，即改革开放的10年，主要是反“左”，如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提倡解放思想，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在反“左”的同时，忽视右的倾向的滋长，于是从1979年就开始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思潮。邓小平从 1979 年起，不断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而前后两位总书记都不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赵紫阳甚至百般刁难，打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以致造成 1988—1989 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恶性发展，成为导致北京风波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忽视抓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改革开放 10 年来的一项失误。国门打开之后，我们吸收了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健康的、进步的文化，对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有益，但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乌七八糟的东西，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价值第一等种种资产阶级人生观和伦理道德观一股脑儿倾泻进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一方面采取措施抵制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另一方面，狠抓教育，提倡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和理想。尽管党中央通过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事实上这个文件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放松和削弱，造成资产阶级思想畅通无阻，而资产阶级思想恰恰是自由化思想的温床。

尽管改革开放 10 年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发生物价上涨过快，社会分配不公和流通领域秩序紊乱三大问题，而流通领域秩序紊乱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相结合又造成贪污腐化、“官倒”、以权谋私等不良现象。这一切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企图推动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蜕变的人们，也就是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如方励之、严家其、万润南之流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以反腐败、反“官倒”等口号为幌子，发动了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府、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尽管物价上涨、分配不公和贪污腐败现象并没有严重到政府要倒台的程度，尽管它们并非动乱发生的主要原因，却是群众所以会被

利用而卷入动乱的重要原因。我认识的许多熟人不同程度地卷入动乱，都是有上述某一种不满，认为学生冲一冲也许可以促使党和政府头脑清醒一点。他们并没有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动机。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反对腐败，反对分配不公，反对通货膨胀的正当要求是应推动党和政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更好地进行改革，却被人利用去反对社会主义了！这就好比有人想往左边走，却被引导朝右转，上当受骗的人们回过头来想想，多么荒唐！

前文曾分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是这次政治动乱的真正原因，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得以泛滥固然有国际国内的背景，就党和政府这方面来说，改革开放10年来，在政治思想领域与右的倾向斗争不力，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是不能辞其咎的。

在回顾了改革开放10年来的情况后，就可以比较清楚地回答为什么剧烈的政治动乱发生在改革开放比较成功的中国。

两种改革、两种前途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无不打着改革的旗号。在中国也不例外。他们把自己叫作“改革派”，而把反对自由化的人叫作“保守派”。他们的这个手法是很有欺骗性的。

1988年9月，党和政府看到经济过热、物价上涨过快、流通领域秩序紊乱，提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立刻跳出来以“改革派”自居，反对“保守派”的“反攻倒算”。严家其和温元凯在《关于时局的对谈》（1988年12月4日《经济学周报》）中攻击治理整顿是“开倒车”，“辛辛苦苦十来年，一夜回到改革前”。严家其虽不指名却露骨地攻击邓小平和李鹏，说：“有些对改革一直有抵触的人正看着中国坏下去，把中国的困难看作是取得权力的机会，准备‘收拾残局’，使中国出现一个长期的停滞或倒退的阶段。”这篇文章在国内和香港不少报刊上转载，它代表着自称“改革派”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反对“保守派”的宣言。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要的是什么样的改革开放呢？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赵紫阳周围的智囊们是有改革的纲领和最终目标的，但是，在前几年里，他们藏一手，没胆量公开提出来。他们的策略是，一步一步来，先给你吃一副药，吃了这副药你就势必要吃他第二副、第三副药，一步步地把你拖到资本主义泥坑里去。近两年，他们窥测方向，感到气候不错，就说得比较明白了。

他们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在《世界经济导报》上，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私有化的方案。有的主张把国有财产分割成股份卖给个人，化为私有；有的主张国家贷款给私人，让他们购买国营企业。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提出疑问，这些“改革方案”果真行得通吗？

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要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取消共产党“一党专政”，搞“三权分立”。他们策动成立什么“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里取消。

总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改革纲领就是一句话，

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他们所主张的开放则是“全盘西化”。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先生们说，他们的改革符合世界潮流。这倒是真话，不过，准确地说，是符合世界上一股右倾倒退的逆流。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所主张的改革开放是促进社会前进的改革开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改革那些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学习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对我们适用的管理方法，利用国外的人材、资金和一切有益的文化。改革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增添活力，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出来。开放是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吸取他国之所长，为我国所用，决不是“全盘西化”。

两种不同的改革目标和方案的对立，是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动乱深层的原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主张受到西方反动势力的青睐，符合他们“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在动乱中他们那么起劲地为之喝采并支援，失败之后，又气急败坏地鼓噪什么“制裁”。这种人的悲剧在于不懂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决不会向任何外国势力屈膝投降。

如何看待中国的“穷”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为什么在改革开放10年中得以恶性泛滥？一方面，党和政府一个时期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